

全案號目換裝卷  
 附刊 25-6 256  
 天津警務委員會

日參  
 D580-8  
 ZGT

中華民國  
 1930

鞏固統一與確保和平

民國十九年十二月

中國國民黨  
 天津特別市  
 黨務整理委員會宣傳部編印

總理遺像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須努力

總理遺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  
 中國之自由平等。深知積  
 四十年之經驗，必須知  
 欲達到此目的，必須  
 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  
 以上等項，我之民族  
 界，共同奮鬥！我之  
 現在，革命尚未成功，  
 凡我同志，務須依照  
 余所著革命方略，建  
 建國之大綱，三民主義  
 及第一次全國代表  
 大會宣言，繼續努力  
 以求貫徹。最近主力  
 張，以開國民會議，及  
 除不平等條約，尤須  
 於最短期間，促其實  
 現！是所至囑！

## 寫在前頭

自十七年北伐完成以來，迄今已匆匆的兩年多了。在這兩年裏的現象，大部分爲野心軍閥與叛黨分子，先後叛變，反抗中央；而關於訓政建設之所有的計劃與方案；則未遑整個的實現。這種現象之形成，固大半是由於空閒與時間之客觀條件所限，可是黨員之不健全，與任黨政工作同志之努力欠當，亦不能不負相當的責任。

這種客觀上所具備的事實，於此次削平閻馮叛逆之下，益令我們有認識與覺悟的必要。所以本黨中負重要責任之同志，於近一二月來，嚴格地檢討了過去的工作，重新地開闢了今後的途徑，同時且本此意義，或發爲演講，或寫爲文章，以喚起同志同胞，共同努力於總理遺教之實現。

這三民主義之革命的運動，又進展到一個新的階段之中，我們深知黨國先進最近所言論與主張，是今後革命的唯一途徑，其傳播之領域愈廣，其入人之程度愈深，則革命工作之發展愈大。因此，我們來編印這本小冊子。

然，討逆戰後黨國領袖所發表的言論極多，這本小冊，不免有掛一漏萬之弊。但是我們搜集所及，只止於此，尙乞閱者有以諒之！

編者 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18卷  
D680.2

ZGT

# 鞏固統一與確保和平目次

鞏固統一與確保和平	蔣中正
討逆戰後是本黨重要關頭	蔣中正
告國民書	蔣中正
告同志書	蔣中正
和平	胡漢民
大局樂觀中之努力與奮鬥	胡漢民
今後之革命工作	何應欽
和平與統一	何應欽
鞏固統一與確定國勢	劉蘆隱
國民今後之最大責任	劉蘆隱
民治基礎之建設	孫科
軍民分治黨政合作	陳銘樞

過去的反省與建設的基礎……………邵元冲

中國之經濟建設與農業政策……………邵元冲

服務的精神與服務的道德……………邵元冲

戰後急應改正之心理……………邵力子

# 鞏固統一與確保和平

蔣中正

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掃除禍國之軍閥，奠立國家之統一，實施三民主義的建設，以進中國於自由平等，此義昭昭，固已夫人而知之矣。北伐完成以來，國民政府即標揭和平統一爲不易之政策，全國人民，恍於民國以來戰禍之相循，莫不延頸企踵，以贊其實現。願編遣決議，實施方始，野心軍人叛跡旋著，自桂系倡亂以迄最近閻馮之叛變，此仆彼起，接踵相屬，囂囂擾擾，亘時兩載，政府不得不戡亂以止亂，國民乃亦不得不犧牲代價以求和平，幸主義已深入乎人心，將士皆奮勇而效命，空前變亂，卒告平除，海宇再一，祥和重現，此戰之後一方面固已證明本黨之主義政策，實順應全國之要求，凡竊據軍隊破壞統一者，任令頑強結合，靡不立趨敗亡，一方面尤使吾人憬悟於和平統一非有二致，而實相貫連，故非鞏固統一，不足以確保和平，亦非全國一致瞭然於和平之真諦，不足以鞏固國家之統一。中正鑒於全國望治之殷，竊願於此戰事結束之際，爲吾同胞首先講明此義也。

夫近世國家。亦唯國際相與，有戰爭與和平之可言耳，寰宇之上，苟其國家組織，已臻健全，必僅有制止叛亂之征誅，而無互訴兵爭之內戰，所謂國內和平云者，乃綱紀嚴明，民

意確固，自能以國家之力量，戡叛亂於未形，舍此而外，和平之名，將無所立，中國自民元以來，既以國民之苟且求安，革命之掃除未竟，坐使軍閥披猖，各私其軍，各私其境，爭雄競武，以陷國家於破碎支離。又值民意未伸，無恥政客，得以恣其淆亂，遂使甲乙鷄蟲之鬥爭，成爲循環習見之故事，迷途忘返，視若固然，迄於近年，統一完成之後，而此奇謬之錯覺，猶深襲於一般之人心，甚至兩年以來，中央確保和平統一之征伐，而國內自命知識份子，尙有以甲乙相斫等觀者，順逆不分，邪正不辨，此而不正其視聽，則國是將何日而定，而和平之保障，又安所得而致耶？

中正深維國人渴望和平之迫切，爰進求確保和平之方法，則以爲下列二義，不可不使全國同胞，深知而共守之，二義維何，

一則政治設施，在不背本黨三民主義建國原則之範圍者，中央必盡量容納國民之意見，而獨不許假借名義，託結於兵戎。

二則統一基礎，必須國家以全副力量，始終維持其鞏固，萬不容任何軍隊，有幾微之破壞。

蓋統一者國家之要素；軍隊者國家之武力。國民革命軍犧牲無數之將士，其最著成績，

即在摧毀個人之武力建立國家之武力，以弼成統一之基礎。既爲國家之武力，自祇應爲國家利益而用，違乎此義即爲叛行，此固至淺之理，三尺童子所能知。然軍閥惡習，蔓延相尋，譬之毒菌潛伏，一觸即發，即如今次討逆之戰，在參加叛亂之各方，實無不沿僭竊割據之舊習有不可告人之隱衷，而其誣罔全國，張皇飾詞：開釁伊始，則又託於兵諫之美名，對中央而爲要挾，一般反覆政客，黨國叛徒，又從而因緣利用之。國民不能早燭其奸謀，徒以和平不可輕易破裂，責中央以非分之容忍，其禍遂勃發而幾於不可收拾。夫無論叛徒竊據，本不以國家利益爲懷也；即使對於國事，真有主張，但既出之以稱兵之形式，則綱紀破壞，所損已多，統一基礎，將安所託？國民果昧於此義，而唯日夕以和平是祈，是直緣木求魚，徒見其可哀而已。

且本黨遵奉 總理遺教，一方於實施訓政，將以培養健實之民權，而鞏固民國之基礎；同時對於經國要政，又匪不以天下爲公之懷，禱祝於全國人民之協力。公私章牘，歷歷可按。初何嘗有深閉固拒之意，謝絕國民之參加，拒納公衆之意見？所篤信固執而要約人民以共守者，獨於根本原則之三民主義，與夫 總理遺教所示之方略步驟，則認爲建國所必需，而未許有所置議。言論自由，不能議及國體，此本近世國家之通則，宜亦爲全國有識之士所當



曲體而共諒者也。中正竊以爲國內未趨久安，其最大障礙，厥惟傳統之觀念未除，思想之中心未立，認叛逆者得與中央相對抗，則統一基礎安往而不搖動，認危害國本爲一種之政爭，則永久和平，將安所得其保障？今者痛苦經歷，亦既宏多，民困國敝，待救孔亟，及此叛亂大定之始，宜有履霜堅冰之思，是用備論統一與和平相關之至理，及其實現之必要條件，爲吾同胞痛切以陳。

吾同胞當知人民對於國家休戚痛養，無不相關，苟其秦越等視，卽爲自違天職，此後關於國家政治施設，在不背總理遺訓之原則下，甚望易旁觀之私議，爲質直之批評，無論匡正闕失，敷陳意見，中央必開衷延納，擇善而從。其或輸才輸力，願共艱難，則選賢與能，本亦不拘一格，而對於國家統一則尤必須全國一致。以純正之民意，爲有力之扶持，苟有禍國政客妖言煽惑，導軍隊以叛亂之漸，刦制中央，破壞統一，無論其事態大小，皆必以極嚴正之法紀相繩，而不稍予以姑息。延納衆長，以期意志之共同；修明綱紀，以保甲兵於勿用。所以保障和平，厥理實無二致，蓋中正認爲目前第一要義：爲鞏固國家之統一，故一切可處以寬大，而破壞統一之事不可恕；一切可容忍，而危害國本之漸不可啟。中正夙昔之所懷如此，今後所秉以努力黨國者，亦仍不外乎此。過去既不顧一切犧牲，以鞏固統一，今後亦

不惜任何犧牲以保障和平。中正惟認鞏固統一，爲完成國民革命惟一之使命，保障和平乃爲國民政府之最大責任，故盡其學生之全力，以赴此鞏固統一保障和平之準的，武侯有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中正不敏，願效愚忠，以報黨國！徒以茲事所繫者大，故不憚細縷，爲吾同胞言之也。

## 討逆戰後是本黨重要關頭

蔣中正

十九年十月二十日在中央紀念週講演

各位同志：今天紀念週本是陳銘樞同志報告，因爲下星期兄弟沒有工夫，不能來此出席，故在陳同志報告以前，兄弟亦有幾句話報告：這次討逆的戰事即將結束，而且已是得到勝利，全國國民和全黨同志，對於這種勝利均是興高采烈的引爲一件很可祝賀和快活的事情，固然打了勝仗，很是可喜可賀，不過要曉得，本黨的成功和三民主義能夠實現與否，却不在乎從前，而是在乎討逆以後，要看本黨同志的工作，到了怎樣一個程度始能決定，所以從前本黨歷經的各種危險，雖則是經過了許多艱苦困難的日子，但還是是本黨的生死關頭，因爲無論中外人士看待中國，均是以爲中國的思想既不統一，向來軍隊的習慣，又可造成軍閥的

層層輩出，給予我們革命的前途許多障礙，這從他們看起來，以爲乃是當然的，沒有甚麼緊要，因爲中國要能實現我們的主義，中國真正拿我們的三民主義統一起來，一定要把軍閥的餘孽完全剷除。然後始可得到一個新的真正統一的希望。所以中外一般人士之看中國，就是看我們這次勝利之後，本黨黨員是怎麼樣的一種態度，動作，來決定我們中國的前途與本黨的勝利，所以這次討逆戰事勝利之後，才真正是本黨生死關頭的時候，現在還不是怎麼值得高興和可賀的時候，要是本黨同志今後的努力犧牲，如同從前在戰場上的同志樣一，或許還能夠完成我們革命的目的，不然，一般人民對於我們的希望很切，或者我們以後的工作，倒不如從前，甚或還比從前要壞，那就糟了。這一點在今天的紀念週席上要請我們全黨同志特別注意。我們想到從前本黨同志的努力犧牲的很多，不僅是在戰場上，即在北平，天津，哈爾濱，察哈爾一帶，我們犧牲的同志也不在少數。不僅是犧牲了許多同志，便是非同志也幫了我們很多忙，不僅是革命同志們受到有形的犧牲，人民也還受了許多無形的犧牲，他們犧牲的代價，完全是希望我們在討逆勝利之後，使得他們能夠享到真正的國民福利，事實上他們可以得到一種利益，惟其是這樣，所以一般人民，一般同志，無論是黨員或非黨員，纔統統希望我們革命成功，戰爭勝利。但是本黨在各地的成績，是怎麼樣呢？各同志當然是有許

多曉得，也有許多不曉得的。

現在我們黨員最要緊的是什麼事情呢？就是要自反，自己省察自己已往的經過有什麼缺點，錯誤，和不好的地方。以後應該怎樣改良並求進步。這乃是我們黨員最緊要的性格，如果我們現在沒有這種性格，便是始終不會進步，而我們個人也始終不會成功的，所以我們黨員最要緊的就是自反，無論什麼人，無論那一天，均不免有做錯事情的，並且一個人每日走了許多地方，更不免要講錯許多話的，如果自己能夠自反，做錯了的事情馬上曉得，講錯了話也馬上知道，知道之後，且能馬上挪來改正。這樣，雖有做錯講錯的所在，而一切的誤點和弱點，到是毋須害怕，因為自己從前做錯了事情，那錯事就是一個教訓，挪這個教訓去改正一切，便是我們很好的材料，良好的教師和先生一樣。所以以後，黨員均須自反，反省我們個人的行動，工作的經過，有怎麼樣的缺點，這是我們黨員必須具備的性格，如無這種性格，便不能做黨員，無論對黨對國，都是一樣，在這國家生死關頭的時候，希望我們黨員真正均能實行自反，方不愧為黨員和參加黨的工作的同志。

其次，無論對黨對人，中國人均有同樣的一種習慣，這種習慣，我們曉得也不僅是中國一個地方有，幾乎全世界的人均普通有這一種性情，凡屬是一個人，或是一個團體，如有了

基礎，有了勢力，有了成功的希望，一般人對於這個人或團體，便有一種感想，在中國人普遍的不好的性情說，就是妒忌。這在我們黨員自是格外應該知道。中國人的性情，無論對個人，對團體，統是這個模樣的。所以黨員既在國民中間祇佔很少數，但是既做了黨員，人家如看見你有一種不好的毛病，即將當作黨員像是一個特殊階級，講得不好，就是如同軍閥一樣，再講不好一點，就是如同鄉下劣紳一樣，現在一般人看見我們的黨員，就是類似一個特殊階級，這是最不好的一種影響和態度，我們要知道，特殊階級是沒有一個不討厭，不排斥的，如果我們黨員不知道這一點，甚至自己以為是一個黨員，仍舊要給人家看作是特殊階級，並且我們自己也當自己是特殊階級，那就糟了。特殊階級沒有不會失敗，沒有能在社會存在的，人家看作我們是特殊階級，真是不幸的一樁事情，我們要盡力避免人家看待我們如同特殊階級纔好，同時我們無論在什麼地方，各級黨部，即有許多人來告我們黨員，告我們黨部的，我們在黨員的立場，和黨的立場上，當然不會庇護原告的人，僅祇注重他們來告的話，對於我們黨員黨部自己的名譽，地位，完全不顧，完全相信他們告發的人，那是當然不會的。而且我們無論到了什麼地方，有人來告我們黨部，說是黨部不好，心裏便覺非常之痛，有人來告我們黨員，說是那一個人不好，心裏也是非之痛。還有，我們對於這種事情發生

的時候，我們便想到現在的黨，黨員各處均受人家的妒忌，排斥，特為造我們的謠言，使得我們黨員不能工作，使得我們黨務不能發達，他們還要特地假造謠言的證據，來誣告我們的黨部和黨員。我們遇到凡有人告我們黨部黨員時，我們一定存到這樣的腦筋，先要知道我們的黨部黨員受到這種恥辱，欺負，然後我們始再平心靜氣的來判斷，調查，審察事實的真象。·究竟是一般普通人告我們黨部黨員不對，還是我們黨部黨員本身不對？這樣辦下來，我們相信一定不會錯的。至少必可十分之九不會錯。我所到的地方，所接近的社會，一般對於我們黨部黨員的影響，印象，均是非常不好，這對我們的黨部黨員是非常之危險的！幾乎沒有一個地方的人，講我們黨部曾為人民打抱不平，為民衆求利益的，所講的話，統統是同人家爭權利，做包庇訴訟的貪污納賄的事情。

一般普通人的毛病，我們各地的黨部黨員差不多也染了那種普遍毛病，這對於黨真是非常危險的事情，可以說一般社會對於我們黨部黨員的影響，均將十分不好了，現在我們既然有了這種毛病，我很可以比方一件事情，這事情是很壞的，我們在前清時候，為什麼要革命，革命起後，為什麼滿清推倒這樣快？我們革命的原因很多，革命思想發生的也很多，第一件事情，就是討厭滿洲人的住地，比如浙江在杭州即有滿洲人的住地，現在旗下馬路一

驟是滿洲人住的，他們就是一種特殊階級，看見我們中國人經過那裏，統統要被敲一下子，旗下住的滿洲人，到處使得我們青年人頭痛，這是我們發生革命思想很多的原因之一個。現在一班社會人士看見我們黨部所在的地方，若同從前看見旗下滿人一樣，那真糟了！再不急謀改過，一般人亦將看待我們的黨部和黨員，如同清朝及滿洲人一樣，那就完了。這樣，我們不僅是對總理不起，也對不起一般已死的同志！現在這個比方很可以當作我們從前沒有革前清的命以前一樣看，這不是糟極了的事嗎？這是多麼危險的事呢？果真如此，失敗一定是很容易，而且很便當的，我的這番意思，比方着告訴各位，應共引為警省，目前實實在在有這樣的情形。而且實實在在這樣的危險，我們必要想出辦法，可使本黨黨員，個個能夠改正起來，改革這個毛病，免除這個危險，以求達到我們革命的目的，最近有許多人講我們黨的制度要改良，組織還是不好。我以為我們黨部的組織和制度，沒有不好的。無論什麼事情，要是負責的人做出毛病來，就無論有怎麼好的制度與好的組織也不相干，如果你有人能夠實實在在進行這工作，做好這事情，就是制度差一點，也不要緊。我以為刻下黨的不健全，並不在制度不好，而實在於我們人員的工作，黨員自己努力不努力，爭氣不爭氣高頭。所以我很相信，黨的制度是不錯的，沒有什麼不好的，現在黨部黨員的傾向不好，不能歸罪

於黨的制度和組織的不好，而乃在於我們黨員自己不能明瞭真正革命的道理，不能做真正革命的工作，甚至還有人以黨的名義來做他個人的事情，這已成爲一種通病，確是最不幸的事情，以後如果發見黨員挪黨的名義招搖納賄，其罪惡實比犯一般法律的刑事罪還要大！黨員同志比之一般社會民衆，我們應該愛黨愛同志，尤要愛護黨的名譽，大家同志對於我們黨員的考察，監督，要格外的嚴謹，認真纔好。

今後，對於我們黨員或黨部，尤其是對於我們黨的辦事人員同一般委員，無論中央委員或各省縣的委員，我們除了自己自反，並時時刻刻自己審察之外，我們還要隨時監督我們自己的同志。檢查我們自己的同志，如果那一個黨員有一點不好的地方，決不要爲他留一點情面，這種情面一留的時候，便是最不行的，也是犯了我們中國人最不好的毛病。爲什麼現在社會上弄得這樣烏煙瘴氣，一點不能發展？就是因爲中國人都是抱着「各人自掃門前雪」的觀念，不管是好人或是歹人，通喜顧情面，得過且過的應付。大家要曉得，某人既入了黨，那個黨員做的事，就同我自己做的一樣，他做不好的事情，就是牽累到我，也就是我做的一樣。所以對於黨中同志有做不好的事情者，一點不能原諒，一定要很嚴厲的監督他們。打仗沒有怎麼困難，打勝仗亦沒有什麼稀奇，那均是很平常普通的事情。以後，要比打仗還要艱難



，我們如真正要犧牲，真正要爲黨而犧牲，如同爲我們自己的家庭一樣，那末，我們爲黨的犧牲，就要比在戰場上犧牲還要來得決心纔好！兄弟個人是以爲黨的危險，不在討伐閻馮之前，而是在討伐閻馮之後，本黨的生命，生死關頭，全在勝利以後，我們個人的危險，黨的危險並不在打仗時候，而是在乎平時，這是我個人的意思和主張，可以告訴各位同志的。現在的情形，作戰時候的危險，同平常時候的危險一個樣子，而且平常時候的艱苦困難比作戰時還要來得多，危險還要來得大，這種道理，要請各位同志明白，黨員對於同志，如曉得旁的黨員發生毛病，貪污納賄的事情，或有敗壞我們黨的名譽的事情，即應疾惡如仇，不留一點情面，致使黨的生命斷絕，對不起總理和一般已死的同志。以後如果黨員有貪污納賄，甚至土豪劣紳還不如的事情，不論他是黨員，他犯了什麼罪就照什麼法律辦，再不能以同志關係而原宥。這一點，今天我對各位同志可以鄭重聲明，今後黨員犯罪或做不法的事情，比不是黨員的還要嚴厲。處分來得還要重大，必須這樣，我們的黨才可以振作起來，我們的黨才可使得一般社會人士信任，不然，一般人看見我們黨員如像從前滿洲人一樣的特殊階級，那我們黨就一定要失敗，而且很快的失敗了。希望各位同志，對於我們自己的黨員，督率檢查要嚴厲從事，這比什麼工作都緊要，不僅是一般同志，就是對於中央委員亦要格外嚴厲，

那裏在的黨員的罪惡，希望我們黨員同志十分的認識，不要以為這並不是黨員的責任，以致弄成湘鄂贛閩各地的風浪，並且使得共產黨還得到一般民衆附和他們，尤其是那幾省的黨部委員，監察委員，和執行委員，省黨部與縣黨部，更要告訴他們，那一個地方有共產黨，就照這個意思辦下去，這不僅是生死成敗所關。我們要以黨治國，一定要先將黨部和黨員整頓之後，纔能有治國的辦法，否則什麼都不能夠談到。望大家同心協力，整個的提起精神來，真真實實的使得黨有充實的力量，能夠治理中國的國家。這是我們今後最要緊的責任！我願同各位同志共同努力，下死而後已的決心，不留一點的情面，致使黨長此奄奄一息來害我們的國家，來達我們的主義，各位同志如能互相勉勵督率，共同希望本黨能夠趕緊去掉從前的毛病，並能實實在在進行以後的工作，這樣下去，我相信一定使能很快成功，這並不是難事。從前所謂三人同志，能夠立國，我們如能全黨同心，當然國家可以治理，主義亦可實行，再不會給共產黨軍閥起來。以前的軍閥能夠殘存，共產黨亦能那樣的擾亂，其罪惡是那一個造成的呢？就是我們黨員做出來的。如果黨員是好的，那一個地方有黨員共產黨就一定不會發生，黨員有力量，軍閥就一定站不住，所以軍閥共黨之所以發生存在，就是黨員同志的責任，那一個地方有共產黨出來，就是那地方黨員最大的恥辱，那一個地方有軍閥出來，就是

我們黨纔可以真正發展起來，使得黨能有真正成功的希望。

對於這件事情，兄弟以爲比打仗還要困難，比打仗還要危險，但是兄弟深望本黨一定能表示他們沒有力量，沒有做黨的工作，表示他們離開了民衆，使得民衆附和共產黨與軍閥，弄得本黨名譽掃地。各位黨員能夠認識這點，相信共產黨一定不能再起來，並且掃除共產黨也很容易，希望各地黨部黨員，要十分的明白這一點，曉得我們的責任和職務，使得共產黨不會發生，軍閥不會再出來，阻礙我們主義的實現，擾亂我們國家的安甯，兄弟今天所講的就是這一點。

## 告國民書

蔣中正

今日爲國慶紀念之令旦，凡我全國國民，懷過去艱難締造之績，宜皆有感奮興起之思。中正督師前綫，當此討逆軍事，漸趨結束，和平統一，重見光明，追維叛亂之殲除，實慨軍興以來，微獨前線將士，勞苦犧牲，卽我全國民衆，或遭受逆軍之蹂躪，或備嘗匪共之殘害，乃至政治建設，以權量緩急而稽其實施，農商白業，以秩序未寧，而陷於停頓，凡此痛苦之代價，咸爲國家之損失。是以此戰之後，在我全國人民，固必須有確實一致之努力，以鞏

固國家之統一，而在負責建國之中央，則尤必於討逆勝利之後，緊接之以政治之刷新，庶可慰舉國嗚嗚之望也。中正久處前方，未能親承吾父老兄弟之讜論，願衷心確信此戰爲中國確立統一最後之一戰，則所以保障此軍事勝利於永久者，必有待於更進一步之戮力。姑就目前爲我同胞所最感切要而亦國家實際所需求者言之則以爲下列五者，實爲刻不容緩之圖：

(一)爲肅清匪共，當前方軍事進展之時，正匪共橫行最烈之日，彼既互爲呼應，我遂兼顧難周，閭閻痛苦，惟茲爲甚，今軍事救平，自當以清除匪共，安定地方爲亟，一俟班師回京，即當負責籌策，積極實施，一面劃定區域，責令分區各負全責，以杜泄沓推諉之風，一面仍定整個會剿計劃，務使剷滅根株，以絕區自爲謀此勦彼竄之弊，擬自軍事告終之日起，期以三月，至多六月，限令一律肅清，用蘇吾同胞切膚之困，而同時則厲行保甲制度，並實行清查戶口，使奸徒無所混匿，人民得所保障，此關於治安者一也。

(二)爲整理財政，關於確立預算，與勵行會計審計制度，歷次中央集會，罔不定爲決議，尅期實行，終以軍閥割據，惡習未除，反動叛變，更迭而起，障礙重疊，輒致稽延。今全國重見和平統一，此後對於財政，不唯須盡量節約，確立適宜之預算，尤須上下共期預算之確實施行。而國家地方之度支支出納，又必對全國民衆，爲絕對之公開。此外則統一幣制，以

濟金融之紊亂，裁撤厘稅，以培產業之元氣，亦必於最短時間，期以實行。此關於財政者二也。

(三)爲澄清吏治，今日吏治之大弊，一曰因循寡效，二曰貪污未除，前者由於權責之未盡分明，後者由於瑕穢之猝難蕩滌，辜人民之期望，爲革命之污點，莫甚於此。自今伊始，務必改善行政系統，確定政治責任，俾機關權限與工作程序劃然分明，絲毫無混，而諉飾及泄沓之風可泯。又必實行監察制度，伸張法紀，檢舉貪婪，從嚴懲治，而貪污始有所儆。此關於吏治者三也。

(四)爲發展經濟，一國之政治，固不與其國民經濟，息息相關。中國數年以來，承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之敝，而重以反動勢力紛起爲祟，民苦流離，戶鮮蓋藏，產業基礎，崩墮將盡。欲爲培養根本之謀，宜以發展經濟爲亟。是尤宜恪遵 總理建國方略之所示，在平等互利的原則下，吸收外資，以從事於產業之開發。唯其用途，宜限於發展交通，整闢水利，及開發農礦，與各種基本工業之三項。而絕對不以之流用於他途，當此統一確奠之際，宜有遠大精密之圖。此關於經濟者四也。

(五)爲厲行地方自治，總理關於建國程序與實行地方政治之遺訓，實爲萬古不易之精

義，亦爲實現真正民權之唯一途徑。中央既確定訓政綱領於先，國府各院部，復規定實施程序於後，對於厲行自治，亦既三令五申，願實際成效，每不能與預定之進程相應，此不唯黨國所缺望，而政權行使，未能爲實際之訓練，真實民意，無由發揮具體之力量，抑亦軍閥官僚共黨政客一切腐惡勢力，所以能劫持吾同胞，脅惑吾同胞，以危害國家之總原因也。今叛亂勢力已告剷除，人民實力，亟宜培養，中正以爲今後政治設施，宜集中於地方自治之積極推進，完成其組織，充實其基礎，中樞以之督促各省，各省以之督促縣區，務使訓政及早期成，而民權真能實現。此又攸關根本之至計也。

綜上五端，或本爲政府職責之所在，或有待全國同胞之協力，中正以爲目前政治最低限度，必期此五者之實現，而後乃可告無罪於國家，謝先烈於地下，爰就一日感想所及，爲吾同胞粗陳其概，匪云息壤之約，聊爲共勉之資。吾同胞當知國家以人民爲主體，必人民對於國家，感休戚一體之義，而後禍國者，無可逞其技，必人民對於國家有正確嚴明之認識，而後政治自能納入於正軌，過去政治設施之未臻健全，固由反動勢力之迭起爲梗，要亦吾同胞漠然於是非邪正之分，放棄其督促政治之天職，與戮力國家之義務，遂令負責者感措施之難從，而奸人轉得竊名義以倡亂，而今而後，應於創深痛鉅之餘，明匹夫有責之義。民國成立

十有九載矣，盤根錯節，更歷已多，除舊布新，端賴羣力，唯我全國同胞其鑒之。

## 告同志書

蔣中正

此次討逆戰事後，深信本黨統一中國之局勢，已經形成。叛黨亂國之徒，今後決無能再起，即起亦自能以主義之偉力戰勝之。然國家內外環境之複雜，人心趨向之尚未歸於共同，政治上與社會上，尚無堅定力量；吾人今後尚須更歷不少艱辛歲月，經過無數之困鬥，又敢斷言。於此惟一仰賴者，惟在我中央同志，確實團結，負起責任，恢復秘密時代以來革命精神，造成強固有力之幹部，以爲摧毀一切困難，提挈一切綱領之原動力。今日實爲黨國生死存亡關頭，而我同志，則立於功罪禍福之歧路者也。中正山居經旬，獨處深念，竊以爲今日下級同志間所應痛切自省之標語曰「爲人」，而我中央同志所應共勉者，則在於「忘我」。本黨政治之無基礎，無辦法，由於下級黨部之不振。黨員今日奚止不能起人感敬，且爲一般人民所側目。此其故，豈我全體黨員人盡不良乎？非也，而實由於多數黨員，尚未具備普通做人之條件，亦且不願遵行普通做人應有之軌轍。革命者之意義，應爲普通完全之人，加上革命之責任；而今之多數黨員，則以權用上非分之攘奪，補充其做人的基本條件之缺損，幾希

不使人民對之日疏日遠，而馴至畏忌如蛇蝎。是以對一般黨員首須勉以先作一普通完全之人，而後黨務解決，始有着落。關於此點，如大會不以爲謬，應請頒布訓令，嚴定戒律，切實誥誡，又須各級監察委員，切實負責，執行威權，庶於黨務有益。至於「忘我」之義，則尤爲我中央同志，能否確實負責之第一先決要件。中正本於同志攻錯立場，敢實言今日吾人大患，皆在不能忘我。中央負責同志，皆勇於任勞，而絕不能坦然任怨。吾中央同志，任事之辛勤，負責之堅卓，卽異邦覬國之士，亦相與致其欽敬。此種精神，至可寶貴。然使不能濟之以疾惡如仇之風格，與視公猶私若將浼焉之精神，則尺寸辛苦之培壅，將不敵稂莠之滋生。試觀今日各地黨務政治，日就腐敗，日就墜落，然近年以來，中央祇有對叛跡旣彰元惡，循行故事，而予以革籍之處分。此外在黨則有中央監委會，在政則有監察與司法機關，而中央又有監督政治之天職，乃國府成立至今，絕未聞有自動參劾一貪墨瀆職之人，或檢舉一件毀法敗紀之事。世上上智下愚，均居少數，大抵可與爲善，可與爲惡。中國昔日尙有御史臺官，職司檢察，姦回知微，賴有此制。今則黨國日日以廉潔語人，而耳目所接，均爲不廉潔之事實；黨國日日以奉法守紀勉人，而到處可開違法亂紀之舉動。甚至黨部人員藉黨營私，受人詬病，予人民以最深刻之不良印象。夫其所以敢於明目張胆以爲惡者，無他，以監察



制度未行，而中央幹部，又大率寬仁有餘，莫肯以父師教督之嚴自任耳。中正固不敢謂吾中央同志，爲徇情忘公，避怨而不任責。然吾人所担負者，既爲非常之重任，則黨國休戚，實已與吾人自身合同爲一體，禍國亂紀之徒，人人得而誅之，吾中央同志，若猶謹守常軌，多所拘忌，以爲不爲其職，不問其事，則更望何人任綱紀肅正之重責。其或對於中正愛護太過，復假以事權之便宜而不欲過問，則益使中正惶疚無地也。其二，中正敢言，吾中央同志間最要之一事，即在分別公私。今中央同志，參在政治工作者，有時移其同志關係上之尊敬愛護與體諒於公務上，而缺乏面折攻錯之美德，亦往往執着自身之動勞與資望，而不樂尊視政法之系統。甚或以爲祇求動機不謬，對中央政令，小有出入，宜無重大影響。不知公務關係，應爲至呆板之關係，若我中央同志，在各部或地方服務者，尙不能尊重中央，則何望於非同志乎？更何以督率七級機關，而望其奉行政令乎，我人在私人關係上，可以不滿於任何之個人，但在公務關係上，應只認識其所任之公職。不能以某甲本爲我所鄙視，今彼任此公職，即並其由此公職所產生之政令而亦蔑視之。又或以爲其在軍事政治著有勳勞，今既負此責任，則成敗利鈍，彼自承當，中央政府或上級機關，應假我以便宜之事權，課我以最後之工作，對於用人行政，絕對不必過問，遇有過問之者，即誤解爲不信任或干涉。此則親政

治爲承包工程，而並不樂受監工者。按照施工細則之指導矣。總理有言：「政治者，衆人之事。」衆人之事至單簡，又至普通者也，吾同志德業個性，自是各有千秋。但所担当者，既爲管理衆人之事之責任，即應裁抑個性，以成就政治上共通性。我人應貢獻特具之長處於黨國，固不待言，然此貢獻，祇應在至淺易至普通至簡單之公共軌範下而貢獻之，方有政治的價值，否則互選其各不同特具之才性，咸欲貫徹其獨到的見解與主張，則公同關係，即無由確立穩固矣。中正聞道較晚，進德未遑，習與性成，常不免有選偏鋒而害公務之處，愆尤叢積，自知甚多。上述之理，乃質陳自身修省體驗之所得，以爲諸同志借境之資，亦不啻一段懺悔的自白耳。其三，中正竊以爲今日國家待舉之事太多，而環境所容許吾人從容處理之時間太促。故最要急務，消極的宜易明法紀，懲姦去惡，使不肖者知所儆惕，無使再爲障礙。積極的應集中人才，俾得各獻能力，以完成國家一切之建設。對於人才之甄用，應有不遺細流而使萬川歸我之量，試寬其限制，慎其審察，試之於事功，繼之於考核，而以公明無私之黜陟濟之。在不背本黨主義政綱之條件下，許通國之人，任全國之事，以彰總理天下爲公之精神，而使羣才咸感激用命。至原爲革命同伍之人，中間以不自愛惜，脫伍而去者，除迷途已深，容之足爲黨國大患者外，悉宜以愷悌惻怛之心，爲開悔悟自新之路，而許其復歸。深

望我中央同志，斟酌於今日情勢之異，宜勿爲過甚束縛，而致盡量之哀矜。吾人之大敵，在軍閥共黨與帝國主義。一時失足之慮，或盲從附和之青年，宜使其各有相當之出路，共濟黨國之艱難。若徒乘塞阻抑，使本黨內部力量、單弱，無所補充，而才氣較爲洋溢之份子，又終於不入常軌，適以資敵而爲患。公私損失，豈堪設想，此又關係大計，有待我中央同志之處已審酌，妥爲抉擇者也。總之，吾人許身革命，此生已無息肩卸責之時，目前亦非汙可小康之局，前途困阻，正復綦多，惟有以捨身報國之誠，矢死靡他之志，一切黨務政治之制度方案，猶僅爲吾人工作遵循之圖案方式，而根本要義，厥在提起萎靡散漫之人心，確立政治中心之力量，此則不能不望吾中央同志集中如火如荼之光熱於一體，而放射之以被於全國。總理革命以來，同志之死於革命者，幾何人，北伐以還，至今日之討逆軍事，爲黨國犧牲之將士，又幾何人，而戰死遺族之寡婦嬰兒，悲苦無告，斷臂折肢之病兵士，呻吟待卹者，又當百萬人。犧牲之巨至此，僅乃關一吾人從頭戮力之新途徑，念民衆之顛連，撫創傷之重疊，於此進不易進，退無可退之時，上之何以對總理在天之靈，下之何以慰戰死將士之烈，如吾同志相念及此，必蹙然而不寧。中正歸自戰陣，益復百感紛集。語有之，疾病痛苦則呼父母，自總理棄同志而長逝，吾人惟有視黨爲家庭，豈無兄弟，如足如手，危苦迫切之詞，

不於吾至親愛之中央同志道之。而將誰身爲言乎？諸同志倘哀其愚忱，而恕其切直，或萬一有可採納，則固不僅中正之私幸也！

## 和平

胡漢民

十九年十月十日

「和平，奮鬥，救中國！」在國慶節重臨和軍事垂定的今日，我們回想，總理這句最終的遺言，尤其覺得有嚴重深切的意義。

我們求得到中國真實永久的和平，才能完成救中國的使命，救中國即是國民革命的目的，要達到這一個目的，便要靠奮鬥。

中國至今所以紛亂不治，所以不能得到真實永久的和平，原因雖多，但事實上表現出來而使我們最容易認識的，一是帝國主義之壓迫侵擾於外，二是封建軍閥之割據作亂於內，這兩種反和平的勢力，交相爲禍，遂造成中國民族的國際地位不平等，政治地位不平等，經濟地位不平等。

在這種外患內憂互相爲患所積累的情形之下，要爲中國求真實永久的和平，而完成救中

國的使命，根本上便須對軍閥不妥協。對帝國主義不妥協，必須把這兩種和平的大障礙除去，才能為中國民族求得國際地位的平等，政治地位的平等，和經濟地位的平等，掃除了軍閥，廢除了帝國主義所以束縛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纔是進了真正永久和平的門戶，做到了民族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經濟地位平等，纔是登了真正永久和平的堂奧，如果不然，軍閥未掃除，而想苟且敷衍與軍閥謀真正永久的和平，不平等條約未取消，而想苟且敷衍向帝國主義謀真正永久的和平，這都不僅是錯誤，簡直是妄想，我們應該知道，和平的基礎，在打破和平的障礙，障礙不去，但謀苟且敷衍過去，這是苟且，不是和平！

這種道理，應該又是簡易又容易了解的，然而事實却每每不然，當我們今日正在努力對內掃蕩一切反動軍閥的殘餘勢力，對外收回一切主權，以期實施建設，使中國走上真正永久和平大道的時候，一般人——尤其是若干所謂智識份子，都渴望立刻和平，他們說：「立刻和平，是我們今日唯一的出路」無論和平的代價如何重大，總要比戰爭便宜，這誠然是真理，但唯其如此，所以就更不能不從真正永久的和平的方向努力，而決不能為一時的苟安着想，唯其消弭戰亂實現和平的心理是我們之所同具，所以不能不深究和平的真偽與久暫，像目前一般人所想望着的立刻和平究竟是真實的，還是虛偽的，是永久的，還是暫時的呢？我敢堅

決的說，假如我們不能根本剷除封建勢力的根株和帝國主義的特權，其實永久的和平是決不會降臨的。換言之，這不是和平之不可想望，而是和平之不可能也。總理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說得是最透澈的，他說：『構成中國之戰禍，實爲互相角立之軍閥，此互相角立之軍閥，各顧其利益，矛盾至於極端，已無調和之可能，即使可能，亦不過各軍閥間之利益得以調和而已，於民衆之利益，固無與也。此僅軍閥之聯合，尚不得謂爲國家之統一也，民衆果何需此乎？……至於知調和之不可能，而惟冀各派之勢力保持均衡，使不相衝突以苟安一時者，則更爲夢想！何則？蓋事實上不能禁軍閥中之一派不對於他派而施以攻擊，且凡屬軍閥，莫不擁有軍隊，而其結果，不能不出於戰爭，出於掠奪，蓋掠奪於鄰省，較之掠奪於本省爲尤易也。』

所以，不剷除軍閥而但求苟安，是不可能的，因爲互相角立之軍閥間，其利益而爲矛盾，連調和亦不可能，即使調和於一時，事實上亦不能禁各軍閥之不出於互相戰爭，互相掠奪，這便連苟安亦不可能。

過去三年來的事實，正是證明 總理這段道理是不可移易的，二三年以來，中央所抱持的政策，便是實現和平，我們深知非和平不能恢復社會的元氣，而予人民以休養生息的機會

，非和平不能充實國家的力量，而推進革命的建設，所以我們就此主張編遣，以樹立國家的軍隊，改造軍人的心理，但是事實上因為還是多少遷就了二三未曾改變面目的殘餘軍閥，遂使編遣之實施，橫受阻礙。自李宗仁白宗禧以至於目前的閻錫山馮玉祥，都因為不曾改變封建割據的心理，不肯接受編遣，並且妄動干戈，陰謀傾覆中央，各求個人野心的狡逞，由此我們可知在物理學上「同一時間與空間不能容有兩個不同的物體」的定律，移到革命的觀點上，便是同時同地不能容許反革命的力量與革命的力量並立，如果並立，則由相拒而至於相爭，至於破壞和平，這一個真理，是絲毫不可移易的了。

由是可知我們所要求的，不是苟安的敷衍的和平，而是剷除一切和平障礙後所獲得的真實永久的和平，中央在過去以至於月前，事實上，一面討逆戡亂，一方力謀建設，都是爲着這一個目標而努力，明白言之，正惟其有破壞和平稱兵作亂之叛變的軍隊，才去制裁反側，戡定內亂，這不是窮兵，更不是黷武，而是保障和平與實現和平所必要的手段，因為假如一個負革命使命的中央，既不能止亂或弭亂於先，又不能戡亂於後，以維護其所樹立所實施的政策，以求國家民族的自由平等，其結果必至任何國家之分崩離析而陷民族於萬劫不復，此不特負革命使命的中央無以自解，抑且無以自存了。

總理在民國十三年北上宣言中，曾明顯的說：「十三年來軍閥本身有新陳代謝，而其性質作用，則自袁世凱以至於曹錕，如出一轍，故北伐之目的，不僅在覆滅曹吳，尤在曹吳覆滅之後，永無同樣繼起之人……蓋必如是，然後國民革命的目的，乃得以掃除障礙之故而活潑進行也」這一段話，即足以證實我們上述的論點，曹吳覆滅之後，有與曹吳同樣繼起之人，在 總理尚且以爲不可，則假如曹吳的本身復起，自然更不行了，而現在若干所謂智識份子，於目前等於曹吳的軍閥，覆滅即在目前的時候，不知道根本上從肅清平和的障礙去着想，却希望着虛偽暫時的和平，這是何等的怪事，的確如和平而可求，則以實現和平爲唯一的政策的中央，又何樂而不爲，但是這種和平，是趙孟儉食朝不及夕的和平，是不可能的和平，即使幸而求得，也是國民所不需要的，這些地方，我們同志同胞，都不能不精密地加以考量。

以這推論到當前的情勢，我們應該認定，已經作亂的人，不能與之講和平，曾經煽亂的人，也不能與之講和平。作亂的人，因爲兵敗力屈，便一反往昔的態度，突然希求和平。可是他的目的究竟何在呢？不用說，是在等他因作戰而喪失的力量恢復到相當的程度時，再行作亂，假如，我們與這等人謀和平，甚至許其和平，結果就是內亂循環不已，而人民所受的



損失，一定更大，所受的痛苦，也一定更深，這是很明顯的，其次，曾經煽亂的人，何以也不能與之講和平呢？因為凡是煽亂的人，一定是一班無恥的官僚與政客。乃至如汪精衛等一切失節的黨人，這些人沒有廉恥，沒有節操，他們看到所賴以生存而作亂者，行將崩潰，早已心慌手亂，不得不高唱虛偽的和平論調，過度目前的難關，再慢慢的求達一己的慾望。如果與這種人講和平，必至為他們所惑，許其和平，其禍害之大，更是不可以推測了。

我們的結論是：要真實永久的和平，惟一正路，第一步在於除去和平障礙，所謂障礙，就是殘餘的軍閥和帝國主義所未完全退回的特權，第二步在於努力實現總理所定三民主義的實際建設，這兩個步驟要相輔而行，才是我們所要求的真實永久的和平，也就是 總理最後囑咐我們「救中國」的惟一途徑。惟有建設三民主義，才有「和平」「救中國」的真實內容，因為惟有這主義才能使民族地位平等，經濟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我們而努力，求民族地位平等，所以就要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以獲得我們民族應有的獨立和自由。要努力求政治地位平等，所以就要剷除封建軍閥寡頭政治而實行地方自治。以伸張人民的權力，要努力求經濟地位平等，所以就要開發交通，厘定生產組織，扶助社會各種實業發展，以蘇民困，這一切，都是為整個民族整個人民求真實永久的和平，而不是與軍閥或帝國主義求一時的苟

安，簡單地說，全國人民有了生活，有了自治權能，有了民族向發展的自由，則真實永久的和平就在其中，如此就是「和平」「救中國」！我們要全國一致向這條大路去「奮鬥」！

## 大局樂觀中之「努力」與「奮鬥」

胡漢民

——十九年十月十三日在立法院紀念週演講——

各位同志：我們的討逆軍事，到現在已經有一相當的結束。自中央以至地方。人人都感覺到：「如閻馮這樣強大的軍閥，掙扎數月，且不能免於覆亡，這於今後一切想擁兵自固的軍人，應該是一個很大的教訓；和平統一的政策，也一定會由此實現了。」根於這種——自中央以至地方的普遍的感覺，便生出莫大的希望，希望今後政府，能由掃除國內殘餘的封建勢力，進而收回被帝國主義者掠奪的特權，——肅清土匪，共產黨，努力訓政的建設，使政治，教育，經濟……種種，都有長足的進展。

這種希望，無疑地是基於人人對於大局樂觀的心理，在革命的——尤其在大亂甫定而將努力策進建設的時期，這種心理，不僅是必然，且還含有最嚴重最深刻的意義。總理說過：「誠是成功的要素，」抽釋其意，便是無論做什麼事，如果要徹底成功，必須身與其事的

人，都具有樂觀的精神。這所謂樂觀不同于普通的解釋，普通人以為樂觀者，疏忽不注意之謂也，——對於任何事件，都掉之以輕心之謂也。其實不然，樂觀是一種心理的現象，——謂一種該在澈底明瞭事實的外延內涵以後，對於工作前途，工作目的，充滿着有把握能成功的心理現象；根於這種心理，便能「努力」「奮鬥」，完成工作的使命，所以唯「樂觀」才能「努力」和「奮鬥」；亦唯能「努力」和「奮鬥」才算真正的「樂觀」。依此推論，則我們今後對於工作的目標，和「努力」「奮鬥」的途徑，自該有真切的認識！

眼前的事實，證實現在是最引人「樂觀」的時期；換言之，便是最感覺到需要努力和奮鬥的時期。但是如何去保持「樂觀」，求繼續的「努力」和「奮鬥」呢？在我們革命的觀點上，不待言是要先「堅決我們革命的信念」，「確立我們革命的人格」；而致此之道，乃在努力於總理再三伸述的「誠意正心」的功夫。總理說：「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話，把一個人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這樣精微開展的理論，無論外國甚麼政治家哲學家，都沒有見到，都沒有說出，這就是我們政治哲學的智識中獨有的寶貝，」這真是有見之言！由於內心的——抽象的克治，便可影響到身外的——實際的事業：無論於理論——於事實，都可肯定他是一個不可移易的真理。這種理由，

在兄弟前幾次的講演中，都已很詳盡地說過了。

許多同志，在做事之餘，有一面講學的，也有一面求學的，這原是很好的事情，但兄弟以為這種做法，祇要能得其意思，而不必向形式方面去計較。因為從廣義說來。我們無論做事講學或求學，都應該認為一種自修的功夫，其次在我們的修養中，應該注意，使身心有均等的發展，而不得有所偏廢！兄弟常常檢點自己，覺得近來自身的修養太差，最近發現兩個毛病，（一）是心理的修養不夠，當事務過於忙迫的時候，心中不免發急，往往不由自主的「疾言遽色」甚至這「疾言」之「言」，竟會使人莫名其妙，固然，要不忙，事實上本做不到；不過既已忙了——天天忙了，似乎早該養成「造次必如是」的習慣，不該再有疾言遽色了；（二）是生理的修養不夠，固然兩年以來，因為常以精神的力量克制病魔，總算天天過着康健的生活；可是國慶日早上，兄弟謁總理墓時。在石階上上下下，便不免氣喘了；才過五十歲的人，便以為已趨衰老，這是兄弟所不承認的。但是少運動，——欠修養，在上述兩件事中，都已獲得明顯的證據！努力進修，也無疑地不容或緩了。

我們以前有一個極端「嚴于律己」的同志，他刻刻檢點自己，省察自己，發現了自己向來的錯誤，心神皇惑不安，好像犯了精神病一般！當時另有一位同志，曾很懇切的勸告他：「

你不應該過于克己，因為凡是人，都一定有錯誤的：你是人中之一人，人有的錯誤，你當然不能免；假如你對自己不想，對人也一定不怒了，這與從前歐洲的清教徒，有什麼區別呢？」兄弟當時聽了這番話，覺得也有相當的理由；不過以為這種話，祇好對如那一位極嚴于律己的同志講講而不能為一般普通人說的。因為自責過甚的人，雖然不一定沒有，但事實上總很少見。如果有人能戮于自責，——時時檢點自己，正是進德的起點，現在的人，常常講恕道，結果是專恕自己，沒恕別人，而不知能不想自己的，才真能恕人，衡以儒家「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的道理，真不知相去幾遠了。其次，如那位同志，當發現了自己向來的錯誤，便不能自安；也是極可取法的一點。孔子所謂「見其過而內自訟」，其涵義本不僅在「內自訟」，而在「內自訟」後，能將過犯統統改掉，佛家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不僅「放下屠刀」而已，而是在「放下屠刀」之後，能有更進步的表現的。從前歐洲清教徒，自己知道自己的罪惡，便天天在上帝面前懺悔，結果是懺而不悔。到後來懺悔一事，竟變成俗禮，——必須奉行的日常功課，這不但不能進德，反戴上了虛偽的面幕，這種做法，試問有甚麼意義呢？

于此我們可以得到兩個意思。即（一）人人必須嚴於自責；（二）自責之餘，必須嚴於改過。目前一切政治黨務，都不能上軌道，刷新改進的第一步，就要一切負所謂黨務政治責任的人

，真實在自責和改過上用功。以前黨務政治辦不好，許多人竟毫無愧怍地向軍事上推。以為事情之不行，皆人家爲之，我不與焉！現在軍事幸告結束，難道以後再辦不好，還好向軍事上推麼？兄弟以爲在今日的黨務政治組織中，本來人人各有專責，負責任的人，能各就自己的範圍內切實整理，併進一步「止於至善」，這樣羣策羣力，則想在最短期內獲得偉大的成績，並不是一件難事。可是現在的情形。究竟如何呢！管政治的人說：「黨務是政治的先驅，黨務沒有辦法，我們的政治，也就無從推進」。辦黨務的人說：「政治是黨務的樞機，政治不上軌道，我們的黨務也終於難以見效」。至於一個兼辦政治黨務的人，因為責來責去，總不免牽涉到自己，所以不是默爾而息，便大發其處處開脫自己的牢騷。這不啻明白的說：「先要人家革好了命，我才來革命，要人家的事上了軌道，我的事才有辦法。這是何等乖謬的現象，一個革命的黨，一個革命的政府，一切以革命自命的黨員和官吏，如上面所表顯出來的，竟無處不是反革命，和被革命。試問「革命」二字究竟將置於何他，我們自己，究竟又自居何等呢。

民國元年，兄弟在臨時政府當秘書長，黃克強先生任陸軍部長兼參謀總長。參謀與陸軍部，一個計劃，一個實行，是兩個絕不相同的機關，黃先生弄在一處，便常常發現衝突和矛盾。兄弟當時曾對黃先生說：「你這樣做法，真確切形成了兩個人格。因為參謀部的人，天

天坐着，本其所學，擬成了許多周詳完密的計劃，想交陸軍部執行；陸軍部收到了這些連篇累牘的計劃，限於人力物力，祇有對之興嘆，結果不是束之高閣，便是予以批駁；參謀部的文書上擬具這些計劃，認為務須施行的是你；陸軍部的文書上，批駁這些計劃；認為窒礙難行的也是你；這真所謂相映成趣了。」黃先生聽了這些話，也不禁啞然失笑——不過當時黃先生所以攪成相互衝突，——極端矛盾的原因。也很可諒解。因為那時黃先生事情極忙，陸軍參謀兩部的事，事實上都交給秘書，司長，以至科員去做；他本人祇簽字劃諾而已，到了參謀部，他看看參謀部所擬的計劃，的確很好，自然便批交陸軍部執行；到了陸軍部，看看實際情形，竟將參謀部的計劃，雖好而難行，便祇有予以批駁了。

這樣我們也可以得到一個教訓，即現在凡在各機關做領袖，——對政治會議負責任的政務官對於職務範圍以內的事，無論如何，應由自己確定統盤的計劃。如果隨便由事務官左右，不但工作效能，無從增進，且還滋生很多的糾紛。就本院來說：如果每個委員會草擬法案，都要由兄弟來參加，甚至秘書編繹統計三處的事都要一一干涉，兄弟精力不及。固不待言，即使能做到，亦徒自苦耳，於事實究有何補呢？所以決大計，定方針，是政務官的事，而切實執行，是事務官的責任。可是現在的所謂政務官，不負責的儘管不負責，負責起來，甚

至連庶務會計都由他擔任，好像一院一部，都祇有他一人似的，過與不及，都是不中繩尺的徵象。這些地方，我們說起來不能不佩服 總理的高明偉大。

總理用人一經他信任以後，規定了職權，在職權範圍以內，任你怎樣做，祇要不背他所定的方針便一切不加聞問。因此人人肯貢獻其聰明才力到所負的職務上。而事亦遂無不舉了！兄弟以爲 總理這種用人的方法——尤其在各機關全無規律的目前十二分值得我們則效的，大家知道現在是正想由人治渡到法治的時期，法治的涵義很廣，但祇就們上述的話引伸，至少可以認識一個意義卽：「法治是不以人爲本位的」換句話說：是完全反乎「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原則的。假如照現在的情形政務官事務官的責任不分明，在權限上相互侵越莫知所止，這連人治的精神都不夠，如何能希望到法治呢？關於黨務政治，我們卑之無甚高論，第一個要點，是在綜覈名實，現在的毛病，是機關多，用人多，靡費多，決議多，而實際的工作却都不可見！難道所謂革命政治的涵義便是如此麼？所以循名責實，在最高的政治機關，亟應勉力，而各機關的負責長官尤其應該有深切的注意！

在綜覈名實的工作中，首先應該糾正的便是兼差。以兄弟論除擔任立法工作外，還兼着很多的職務，兄弟自問沒有兼人之才便不能不靠勤來補拙，可是勤了這裏使怠了那裏，往往



發生很多的困難。有時開會，因為事實上不能不到，便勉強去坐一下，其實何嘗能聚精會神去討論！再加以會客看書一天非忙到十三四小時不止，於是講話要發氣，寫字也不能甯靜了！可是近來很多同志都渴望兼差，好像自己精力沛然，應付一切一定能綽有餘裕似的！果然是他的精力過人麼？非也，不過想藉兼差以增進個人地位而已。這真是近來莫大的弊端！總理說：「人人應以服務為目的，不應以奪取為目的」；服務是為人的，奪取是為己的，這是革命與反革命嚴明的界劃，我們同志不問自己的能力如何，事情的輕重如何，為了個人好處，便拚命兼差，最是不好的現象。這種現象，在我們綜核名實，以刷新黨務與政治的工作中，不能不首先予以糾正！

關於黨務，兄弟近來也有些感想，可以和各位談談。兄弟以為成立一個黨部，——有所謂黨務工作人員，不在乎「等因奉此」，「呈上令下」的攪文書，——弄成所謂黨部的衙門化；而在乎有事的時候。大家能一致努力，實際上負起啓發民衆，領導民衆的重任。現在內地「黨委」之成「黨官」已是普遍的事實，這種事實，使我們知道黨部組織之根本改革，是一個最嚴重最切要的問題，而改革革命的入手方法則仿行海外黨部的組織應該比較的最能見效了。

海外黨部有許多為防居留政府的取締，都假俱樂部等為集會之地。凡所謂執行委員，大

半由當地本有職業而聲望素著的人充任，這種執委，祇有義務，沒有權利，爲黨工作，純粹本着犧牲爲羣的精神，他們無事時散處各地，幹着各人的營生，如果開會，總是爲着因祖國募捐或其他重要的事務；開會時，各人的精神都很興奮，議案一經議決，便立刻執行，如在教育方面，則辦學校，在宣傳方面，則出版報紙，其他黨員。不論在黨部工作與否，精神一貫，非常整齊！決不像現在各地方的下級黨部，那樣把開會當作兒戲，瞌睡的也有，嘻笑的也有，挨過多少時間，便了却一樁例行公事的，這不能不算是極可取法的地方！

至于內地的黨部呢！開會，是例行公事，會議錄可以刻書，而決議之能否實行或者大家是否真正負起責任來實行，却視作會議以外的事，決不願意去過問了。更甚荒謬的，如果遇到開會時無案可議，就東抄西襲，敷衍塞責，有時道聽塗說，偶然在新聞紙上看到若干新聞，便不問真假虛實，即做了提案來會議。區分部呈區黨部，區黨部正愁無案可議，便將它決議轉呈縣黨部，由縣黨部呈到省黨部，省黨部也不暇究問，便一徑呈到中央來，中央對於這種毫無根據毫無理由的決議，當然很用心的加以批駁，於是又要順次由省黨部，縣黨部，：以至於區分部。一個全無影響的提案，才算了結了。這種「徒災梨棗」的辦法，那裏是爲黨服務，簡直是開玩笑罷了！固然，下級黨部之有此謬誤，是由于中央方面沒有一個委員可以

隨時去觀察或糾正。但是黨部的組織不良，一般所謂黨委，事實上是不能啓發民衆，領導民衆的「黨官」或「黨紳」，也是一個重大的原因。

兄弟今天很拉雜的報告這些，最主要的意思，是在希望我們同志，都能本「嚴於責己」的精神，時時檢點自己，糾正自己；現在又已欣逢大有爲的「樂觀」的時機了，我們要認清「樂觀」的真意義，真實爲着革命的前途「努力」「奮鬥」，以期達到國民革命最終的目的！

## 今後之革命工作

何應欽

——在鄭州行營 總理紀念週講演——

各位同志，由上週的軍事情形看來，大約在最近期內，一定可以完全結束。西進各軍，於有日上午十時佔領潼關。潼關是陝西唯一要隘，潼關以西，都是平坦大道，無險可守。潼關一失，西安不成問題。劉郁芬宋哲元亦有通電聽候中央處置，陝西全境，大約不必再經如何的戰爭，就可以底定了。至於河北岸的西北軍，係孫連仲統率，聽說馮玉祥離開部隊的時候，命令鹿鍾麟代理，欲以鹿爲替身，向中央接洽以保全一部份的實力。鹿因中央軍入陝，命孫率部往援潼關，孫置之不理，并命代表到南京及鄭州表示服從中央。鹿鍾麟見勢不佳，

遂徵服宵遁。總之西北將士，久受馮氏個人的挾持，已有相當覺悟，深明大義者，不乏其人。今後馮氏再不能以西北軍爲其個人的工具了。凡是把持軍隊把持地盤的人，無論如何奸險詭譎，結果如出一轍，終於自取滅亡。就是最會計算盈虧的閻錫山，也算不到此次會有如此的慘敗。軍閥末路，革命民衆的裁判，早就決定他們的命運了。可是軍事雖然勝利，絕不是我們樂而忘憂的時候。我們對革命的前途，固然自始至終抱着樂觀必成的心理，而對於革命的工作，却必須自始至終具有努力不懈的精神。革命尙未成功，三民主義沒有實現，若果我們因一時的小小進步，遂忘了總理努力的遺訓，就難免不有更大的失敗，要保持鮮血換來的成績。我們目前得注意幾件最切迫而不可稍緩的工作：

(一)清除匪共 因爲戰爭的關係，散軍流民，趨而爲匪。少數共產黨，從而利用之。於是攻城掠地，殺人放火，無所不至。地方治安，無法維持。現在全國各省，幾乎沒有那一省不受匪共的騷擾。良善的民衆，不能安居樂業。若長此以往，聽其支蔓，則社會的秩序，必將破壞無遺，其爲害之烈，或且更甚於軍閥。革命的目的，在爲民衆謀利益，當前最要緊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使民衆得到安居樂業的機會。假使連安居樂業四字還辦不到，其他一切，更是不能充飢的畫餅。因匪共騷擾而流離轉徙的民衆，切迫的希望是安居樂業，替民衆服務

的政府，無論如何，必須努力先去滿足一般民衆這種迫切的希望。現在大戰已經結束，只要各省的政府，以及軍事長官，大家認爲清除匪共是自己的責任，認爲不能清除匪共，是莫大的恥辱。至多一年半載，必然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如果敷衍因循，使民衆長期陷於水深火熱之中，而莫能振拔，不只是不盡職，簡直是不革命。我們認爲清除匪共，是軍政負責者當前再重要不過的職責。

(二)發展交通 交通的發展，與文化的普及，國家的統一，匪患的滅除，都有最密切的關係。關於發展交通，我認爲敷設鐵道，是非常緊要，而最緊要的，尤其是先行完成粵漢隴海兩大幹線的建築。粵漢鐵道完成，則南北之交通便；隴海鐵道完成，則東西之交通便，交通既便，許多富源，可以開發，許多失業的民衆，可以得到工作 所有匪徒，不易隱匿。野心不逞之輩，也不敢輕易稱兵造亂。如此才可以成功一個統一的國家，一個生機勃然的國家。東北西北本是我國兩大寶藏，西北因爲連年以來，受馮玉祥的蹂躪，弄得民不聊生。以視東北，直有天上地下之別。中央要拯救西北的災荒，也常常格於交通的不便。可知敷設鐵道，實屬不容稍緩了。其次整理航政，也是很緊要的事情。每次國內的戰爭，完全封僱本國的商輪，反予外國商輪以獨占營業的機會。外國輪船公司，一天一天的發達，我國招商局以

及三北公司寧紹公司，年年虧累。不但說不上發達，簡直快要倒閉了。海外的運輸，中國是完全沒有地位。而國內的運輸，也在被外人壟斷着。在如此情況之下，中國的商業，如何不被外人操縱，中國的經濟如何不受外人的剝削。我們希望當此軍事結束之後，政府與民衆通力合作，以整理航業。我以國家之有交通，猶人身之有脈絡，脈絡貫通，然後人才有生機，交通便利，然後國家可以謀發展。

(三)整理軍隊 大戰之後，軍隊的紀律廢弛，必須切實訓練，加以整理，國家軍隊的設置，以捍禦外侮，鞏固國防爲最大的目的。我們的軍隊，最低限度，要訓練到能夠和侵略我們的帝國主義者的軍隊相抵抗，才不致徒有軍隊的虛名。現在中國的軍隊，一方面苦于數量過多，一方面更苦於質量之不足。我們必須努力整理。要便在財政上不因軍隊而感困難，國防上能因軍隊而獲得保障。否則軍隊越多，民衆的負擔越重，民衆的痛苦更深，不能衛國反而擾民的軍隊，不如無有之爲愈。有許多人以為中國的軍隊過多，裁兵實無善法，此種見解，似是而非，就我們過去經驗而論，兵不必如何的裁，只要在一定期間，不去招募補充，就可以得到減少兵額的結果。普通說「兵無三日全」，因爲在頻年戰爭不斷的情況之下，生命的拋擲，薪餉的缺乏，已經使得一般人不願當兵，惟苦無歸農或改業的機會。一旦有歸農和

改業的機會，然相率而去，不裁自裁。何況中國的士兵，大都來自田間，富有作工的能力，只要政府有一定的辦法，官長有覺悟的決心，定不難化兵爲工，實行 總理的兵工政策，以消納過剩的軍隊，我們看見此次大戰，無論敵我兩軍的部隊，工事都做得很好，時間也做得很長。若不是戰爭，而以此種精神開鑿運河敷設鐵道，可知絕對不是甚麼難事。所以軍事之能否辦理，其關鍵不在士兵，而在官長之有無覺悟，能否以軍隊爲國家的軍隊。若果當官長的，以兵爲私產，爲商品，爲工具，便有再好的辦法，也不行不通。編遣會議的議決案，未嘗不好，而有了甘爲軍閥閻錫山馮玉祥，等於具文。歷史給予我們的教訓，袁世凱失敗了，曹錕吳佩孚失敗了，張宗昌孫傳芳失敗了，馮玉祥閻錫山又失敗了。稍爲有點智識的人，應該明白封建割據違反國民全體的希望，軍閥所行之路，完全是滅亡之路，而不肯輕於嘗試。近來許多的軍官，似乎都有了國家的思想，相當的覺悟。大概今後軍事的整理，不致再遭受重大的困難。軍事可以整理然後說得訓政建設啊！

（四）整理黨務 要保障軍事勝利的成績，完成革命的全功，必須有賴於黨務工作的進展。在反動勢力強大的時候，黨務不能公開活動，一般同志，工作非常緊張。到了黨已取得政權，則工作遠不如前。而黨的官僚化，便成的黨中最大的危險。黨員的工作，在使一般民衆

明瞭三民主義，在使黨與民衆聯爲一片，而不應使民衆，很顯然的把黨認爲一種特殊階級。民衆認黨爲特殊階級，便與黨日離日遠。試問沒有民衆的黨，還成甚麼黨呢？現在有許多地方，民衆視黨部如衙門。黨部的委員亦自視爲官吏。民衆覺得有了黨部，便多了一些官吏，多了一些麻煩。他們并不會在黨部指導之下，得到如何的利益。如此的黨部，自然沒有力量可言。軍隊的力量，可以打倒當前的軍閥，但不能防止軍閥的產生。要防止軍閥的產生，則辦理黨務的同志，應該明瞭自己過去的缺點，努力於主義的宣傳，盡量替民衆解除痛苦，然後可以得到民衆的同情，使民衆信托本黨，黨與民衆，成爲一個整個的力量，一個能消滅一切反動而所向無敵的力量。

(五)澄清吏治 以升官發財爲中心思想的中國社會，貪官污吏，隨在皆是。常常聽見政界的朋友，談論某縣某缺時肥瘠，很少聽見對於某縣某事有如何整理的意見。常常有許多人連簡任官荐任官都不肯做，却甘去充當一局所的卡員。政治上有這樣奇怪的現象，當然財政的收入，大部分飽了少數人的私囊。而多數的民衆，在政治上所享受的只是黑暗和壓迫了。革命不只是革軍閥的命，革帝國主義的命，而是要並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一切封建勢力之命而悉行盡革之。容許貪官污吏的存在，就是革命沒有成功。民衆就得不到革命的實惠。從前軍



事時期，大家全付的精神，都注意在消滅當前的大敵，而沒有顧到潛伏在各地方的敵人。現在軍閥奔潰了，我們對於潛伏在各地方的敵人，必須設法肅清。我們要嚴懲貪污，以澄清吏治解除民衆的痛苦。

比方中國是一個久病垂危的人，軍閥是其病根，現在病根雖得除盡，但是病到將愈的時候，正是他最危險的時候，一個不小心，便舊病復發，更爲難治，或且不可救藥。所以軍事勝利，統一將近告成，正是我們朝野盱眙之秋，我們要小心謹慎，珍重調養，不再讓病魔來侵。三民主義一日不完全實現，我們無所謂樂觀，也無所謂悲觀。我們尙未得到安，更當不忘危，我們惟有以無間始終的精神，繼續不斷的努力。

## 和平與統一

何應欽

——十九年十月十日——

辛亥革命，經了若干先烈志士的流血犧牲，以及全國民衆受了莫大的痛苦和損失，然後能推翻滿清的君主專制，建立中華民國的初基，如此辛苦艱難締造而成的雙十節，自然值得我們全國民衆年年歡忻鼓舞地來紀念他，慶祝他，但是我們不要太忽略了，辛亥革命，僅僅

算是掛上了一個民國的空招牌，並沒有建設起民國的實際，由推翻滿清一點而論，固然算是成功，在全部革命的目的而論，究不能不為失敗，革命的目的，不只在推翻滿清，不只在獲得中華民國的虛名，而在造成一個三民主義自由平等的新中國，因此我們居今日而紀念國慶，不宜只徒歡忻鼓舞，稱頌太平，必須全國上下繼續努力，以求充實民國的內容，完成革命的全功，然後方不失紀念國慶的意義。

自民國成立至十三年北伐以前完全是封建軍閥分爭割據的時期，同時也就是革命勢力爭育長成時期，北伐以後，乃是革命勢力與封建軍閥正式開始接戰的時期，現在已經是快到封建軍閥崩潰與滅亡的時期了，在前兩期全國民衆，都避免不了戰爭的痛苦和損失，戰爭的消弭和平的實現，必須在封建軍閥崩潰與滅亡之後，所以全國民衆，若果希望早日解除戰爭的痛苦，應該努力促成封建軍閥的崩潰和滅亡，然後才可以達到自己的目的。

革命與反革命，是不相調和的，革命勢力的進展，常足以引起反革命勢力的聯合，從前一切投機取巧以革命為利的反動份子，因為革命內部力量的充實，到了一定的程度無所再隱藏於革命旗幟之下，於是互相利用，互相勾結，形成一種腐惡污穢的大團結，以為最後的掙扎，所以革命的勢力越是向前進展，反革命敵人將越發顯露，越發增多，而革命的環境將越發

更加險惡，國民革命最大的敵人，是帝國主義，是軍閥，是共產黨，這三種敵人，都利於中國的分崩離析，而不利於中國的統一，利於國民革命的失敗，而不利於國民革命的成功，當革命勢力單弱不是明顯地妨害他們的利益時，似乎還可勉強敷衍，一到他們已經覺得革命的勢力和他們自己的利益將近發生衝突的時候，他們便用盡一切的手段，起而破壞革命，過去的事實·完全如此。以共產黨而論·本黨在十三年北伐之前，他們只是混迹在本黨之中，以爲活動，一到本黨勢力進展到了武漢寧滬·將有統一中國之勢力·於是不利本黨統一中國和完成國民革命的共產黨便着急異常，非千方百計，破壞本黨，分裂本黨不可，其次帝國主義者，當國民政府偏安廣東一隅之際，認爲無甚妨害，反而時來周旋，可是革命軍到了長江，外國的軍輪便紛紛調遣，如臨大敵·等到進逼黃河，簡直會有人不顧一切，派兵來華，生生地造成濟南的慘案，至於軍閥的行動，更不待說：革命軍初攻取武漢，孫傳芳並不會感覺到有應援吳佩孚的必要，而北伐完成的今日，則利害極不相容的馮玉祥，閻錫山，都可以團成一塊，現在不單是軍閥與軍閥的聯合，而是軍閥共產黨帝國主義一切反動勢力的大聯合，我們看見中央軍討伐閻馮戰爭最烈的時候，共產黨拚命在湘鄂等省殺人放火擾亂後方，帝國主義者的報紙，拚命的替叛逆造謠，帝國主義者的軍艦，公然保護反動份子到中央勢力所及的地方

，來圖謀活，總結說一句，軍閥共產黨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都懷抱着同一的希望，甚麼希望呢，就是胡展堂先生說過的，希冀我們統一統三而不統一，尤其是不願意在中國國民黨領導之下，完成統一，因為國民黨統一了中國，非實現三民主義不可，三民主義實現，則軍閥莫能倖存，帝國主義無從侵略，共產黨也喪失其擾亂廣行的機會，所以軍閥共產黨帝國主義者，相互間的利害，雖然不同，而破壞統一阻撓國民革命，却是他們共同的目標，因此遂造成此次反動大聯合的局面，以致反抗中央，擾亂地方，兵連禍結，不可解，國家的情形到了現在確是危險極了，帝國主義者不但能獲得不肯輕易允許廢除不平等條約，而且還竭力幫助中國的內亂，以期保持其不當取得的權利，共產黨遭受擄掠，偏于東南湖鄂贛，人民十之八九，不能安居樂業，軍閥呢，肆意之亂，禍害民命，非到水盡山窮，野心不死，中央止亂無方，惟有戡亂，大戰一起，職工人等的痛苦如何，全國損失的重大又爲如何？本來陷于次殖民地的中國，數十年來，受帝國主義者經濟的壓榨，生產落後，已無莫可振拔，再加以爭頻仍，使農失其耕，商閉其業，乏容納之所，有智識，有專門技能的人，尋不到適當的用途，失業激增，人心思亂，長此以往，勢不至國民經濟完全破產，民族生產完全斬絕不止，所以當此時期，不只是少數識見的人，會倡導和平，實實在在全國的民衆，

沒有那一個不需要着和平，渴望着和平，不過我們要知道，和平與統一，是有不可分解的關係，能統一自然會和平；離開了統一，則和平莫由實現，國民政府自來即以和平統一爲政策，數年之中，對於桂系，對於閻馮等之野心暴露，無不盡情開導，委曲求全，然而李宗仁胡宗鐸，已經說明要對中央軍迎頭痛擊了，中央能夠聽其痛擊，而不問嗎？閻錫山馮玉祥，已經稱兵動旅，進攻徐州，進攻南京了，難道中央政府也就聽其自然嗎？軍閥們私慾的發展，不是中央政府的寬大所能包容的，軍閥們執迷作惡的習性，不是中央政府感化所能收效的，容忍不可，感化不能，造亂者已經甘冒不韙，公然背叛中央，進攻中央了，試問中央究竟應該任其橫行殃民禍國而不顧嗎？還是應該整飭國家的紀綱，保障民族的生存，認爲責無旁貸，而實行戡亂呢，戰爭至此，當然不能免避，過去的事實，完全證明，革命的中央，並不是贖武窮兵，而是容忍不可，免避不能，然後才不得已忍痛討逆，討逆的目的在戡亂，在止亂，不是違反和平，而是要斷求真正永久的和平，戰爭的原因，是由於軍閥的造亂，中央是戡亂，所以封建軍閥一日不去，則割據分裂，謀亂禍國，所謂和平殆不可得而親，要免避戰爭，必須認明造亂的軍閥，消滅造亂的原因，辛亥革命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爲當時許多黨員，不十二分信仰 總理，不按照 總理的主義政策方略去實行，輕易把政權讓于反革命的首領

袁世凱，於是反革命的勢力潛滋暗長，終於破壞了革命勢力，形成無數的軍閥，興起了國內十幾年來的內亂，欲安民衆，而民衆之痛苦愈深，欲求和平，而和平永不可得，此種失敗，給予我們最大的教訓，我們今後應該知道永久的和平，必須於反革勢消滅中求之，若果只知有和平，而不知有統一，不知要由統一以求實現三民主義，則一時妥協的局面，又播下戰爭的種子了，革命的同志同胞們，我們的需要的是真正的統一，永久的和平，我們去完成國民革命，建設三民主義的羈中國，不宜畏難偷惰，暫求苟安一時，而忘却轉瞬卽至相延不止的戰禍。

我們要知道當十三年以前軍閥混戰的時期，所謂直皖之戰，是吳佩孚和段祺瑞在在打仗，江浙之戰，是齊燮元和盧永祥在打仗，所以有些人，簡直稱爲齊盧之戰，比較名副其實，這種直皖之戰，齊盧之戰，和現在的戰爭比較，其意義絕不相同，從前是私人的爭奪相殺，而現在是革命的中央討伐叛逆的軍閥，換句話說，就是革命與反革命的戰爭，私人的爭奪，每每到了雙方神疲力竭的時候，只要有幾個和平老人出來調停一下，好在彼此都無所謂，便不妨言歸於好，而妥協的局面遂告成立，至於革命與反革命的戰爭，絕無所謂妥協，只有三種結果，（一）革命的勢力，敵不過封建勢力，而遭受頓挫，（二）封建軍閥的滅亡，（三）封建

軍閥的悔過輸誠，在第一種的時候，革命的勢力雖然遭受頓挫，終必突飛猛進，以獲得最後的勝利，辛亥革命失敗的教訓，便促成此次革命的進展，因此我們可以說，革命只有勝利的，所謂失敗也者，就是勝利的預備，成功的先機，革命尙未成功，反革命勢力披猖爭地爭城，殺人不息，那有絲毫和平的曙光，所以軍閥割據，祇有繼續不斷的戰爭，惟有一切軍閥，被革命的勢力所消滅或悔悟而真正投誠，才有和平，才能夠得到永久的和平，進一步說，革命與反革命的戰爭，既不是個人的問題，則所謂軍閥的投誠，當然不是人對人的讓步屈服而已，最低限度，是要造亂的軍閥悔罪以謝國人，並且在事實上，要絕對拋棄其軍閥的行爲將所有軍隊公之于黨國，聽命於中央，假如沒有這種懇切的表示，就不是真正的覺悟，真正的悔過，而是野心不死，慶父不除，魯難未已！軍閥猶在，和平安養，全國民衆不可不注意啊！

！軍閥們最後投機當其失敗之後，每每利用全國渴望和平的心理，以表伴存，而保全實力，本來戰爭一久自然有許多有力量，有聲譽，不忍民生疾苦的人，出來倡導和平，於是造亂者趁此機會好像一經提出和平的口號，所有禍國殃民的罪惡，通通在不問不議之列，也就隨聲附和，和平和平，不是民衆的福音，到變成了軍閥危時護身的靈符，種種過去的事情，真是滑稽而又令人嘆息！你們看造亂失敗的閻馮，將來又會主張和平的，我們懲前毖後，惟有

擁護中央和平統一的政策，擁護張副司令，尊重統一，聽候中央處置的主張，我們固然需要和平，但是我們要審慎考慮，究竟這種和平，是否可靠，是否是和平之後，還伏有莫大的危機，我們不能盲目地承認，凡是和平，都是好的，我們時時刻刻不忘和平，但是我們却不能一時忘了統一。不要忘了爲實現三民主義而有絕對必要性的統一。

統一不是某人服從某人，不是乙省服從甲省，更不是北方服從南方，或者是南方服從北方，而是各省各地的軍政民政財政……一切，要聽命中央，要遵行中央政府的法令，整個的國家，不容任何人使之分裂，國家的軍隊土地財力，不容任何人據爲已有，我們相信全國民衆，沒有一個是以統一爲不利，是不願意統一的，即以閻馮宰割下的山陝而論，試問山西人陝西人不是中國人嗎？難道他們只求山西好，陝西好，而不望中國好嗎？稍爲有點智識的山西人陝西人，難道不明白，若果中國滅亡，山西陝西斷無單獨倖存之理，同是中國人，當然希望有一個統一的國家，但是閻馮軍閥，偏偏利用國民智識的欠缺，分出南北的界限，造出種種無謂謠言，他們以爲中央軍討伐叛逆，是南方征服北方，希圖藉地區的保障，苟延其軍閥生活的殘喘，殊不知中央是全國的中央，絕不是每一方的中央，中央所要討伐的只是閻馮軍閥，絕不施於那一省那一方的民衆，此種意義，非常顯明，北方的民衆，又何嘗肯甘



受其愚呢。

我們可以說，和平是革命成功的結果，而不是革命必取的手段，統一並不是革命的成功，而只是革命必經的過程，因此我們更可以明白了，必須先有統一，而後才有和平，和平不是離開統一的意義可以實現的，離開統一而談和平，就是苟安是妥協，是不革命。是予軍閥以培養的機會，是為大亂種無窮的惡因，全國民衆啊！你們最歡迎的是和平，然而你們最要當心的也就是和平，我們既然認清中國的環境，非實行三民主義不足以挽救危亡，非在中國國民黨領導之下，不足以實現三民主義，而且認定要挽救國家的危亡，要實行三民主義，非先促成國家的統一不可，所以現在我們全國同胞，惟一的出路，就是要革命，要擁護革命的中央，消滅叛亂的軍閥，完成國家的統一，我們當着這十九年的雙十節，回想起辛亥革命，以若干民衆的痛苦，若干志士的頭顱換來的成績，曾經誤於和平妥協，輕輕易易就斷送了，自十三年北伐以來，又不知有若干同志的犧牲，幾多民衆的流離，而後能有今日的局面，當此殘餘軍閥最後崩潰的時候，我們萬不可再蹈辛亥革命的覆轍，使數年重大的犧牲，又化為烏有，我們酷愛和平，我們惟有全國一致剷除破壞和平的軍閥，不宜聽破壞和平的軍閥投機取巧，一點不負責任，然後革命又可以早日成功，國家的前途才有良好途希望啊！

# 鞏固統一與確定國勢

劉蘆隱

十九年十月十日

由閻錫山接二連三嗾使而起的幾次叛亂，到國慶重臨的今日，可算是一齣戡平了。倘使國人把討桂討馮討唐討閻馮這幾次的軍事，僅僅視爲銷滅了幾個軍閥個人，那便是太淺視了幾次戰事的意義。國民革命軍自廣東出發以來，所傾覆的軍閥很多，但是這幾次傾覆桂系和馮閻諸軍閥的意義，比以前傾覆吳佩孚孫傳芳一類的軍閥遠更重大。以前傾覆吳孫諸軍閥，只是樹立了革命的政權而這幾次接連的傾覆李白張唐馮閻諸軍閥，便是進一步鞏固了統一的國家基礎，簡言之，以前所爭的，是不打倒吳孫諸軍閥，無由摧毀袁世凱傳統下來的政制，這幾次所爭的是不蕩平馮閻諸叛逆，無由鞏固三民主義的國基。假使國家的統一不能鞏固，那就等於破屋覆巢，豈尚有三民主義孵化的餘地？由此可知目前軍事的勝利，不只是銷滅了軍閥，而且是確立了國基，不只是使革命不致陷於失敗，而且是使國家不致陷於分裂。所以這次勝利，不可僅僅視爲國民黨戰勝了幾個軍閥，尤其應該視爲國民戰勝了破壞國家統一的叛逆。在這一次的總勝利之下，直接證明了凡是私人的軍隊，和私人軍隊所佔據的地盤，是

不能存在的，軍隊若不能成爲國家軍隊，便是國家沒有了武力，國家土地若只任軍人佔爲地盤，便是國家沒有領土。這一次掃平閻馮，在國家方面，所爭的是要確立國家的武，統一國家的治權，從此以後，軍人要曉得軍隊只可駐防，而不能把防地據爲私產，各省固是國家的行政區域，而不可據爲軍人的地盤去自己封建起來。尤其不可憑藉各省行政區域去希圖侵蝕國家應有的權力。閻馮的失敗，正足證明他希圖把防地據爲私產而作法是不行的，把國家行政區域據爲自己的封建是不行的，把國家應有的權力據爲私產而作法是不行的，這種種不行處，不僅是由於他們自身的不行，而尤其是由於這國家所不容許。『國家者，人之積』，到了人人都知道軍隊屬於國家，土地屬於國家，而不應爲一二人據爲私有者，今日，這種普遍的觀念，便是一個偉大的力量，而這一個人偉大的力量，便使閻馮不能逃避最後的失敗。但是我們這次討論，不僅是爲國家爭統一，而同時是爲黨爭一條實行二民主義的正路。閻馮反叛，純然是爲了保持他們個人的割據，不肯將應歸國家的軍隊交給整個政府夠不上談黨不黨或主義不主義的問題。攀附閻馮而反抗中央的政客，其作亂的動機却與閻馮有別。這些政客很明顯的有兩派：一派是根本不要國民黨和三民主義；一派是假冒着國民黨而且竊取着總理若干遺言，以作他們掩護反動的口號。根本不要國民黨的那些反動政客

· 只是時代的落伍者，他們既已與閻馮同遭覆敗，我們亦不必和他們談什麼理論。至於假冒黨的招牌和竊取黨的主義的那些反動政客，又是怎樣呢？他們在反動當中所提出許多的空頭理論，我們把它檢查下來，消極方面只說了反對『個人治黨』和『個人治軍』兩句話，積極方面只說了『扶植民主的勢力』一句話。就作用上來批評這三句話，可以說前二句是誣鑿事實，後一句是無病呻吟。如果我們試把事實剖析一下，就可明瞭我的批評不是過分。

他們攻擊我們個人治黨，這是誣鑿事實的，他們誣鑿三全大會為非法，而他們就以此為攻擊個人治黨的根據。要曉得三全大會代表的產生，和三屆中央執監委員的選舉，都是依照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成規的。第一屆的成規，二屆照用了就是合法，三屆照用了就是非法，這是那裏來的法理呢？汪精衛是諷指三屆中央執監委員為用圈定方法產生最力的一人，他以為唯有二屆的中委才是經過慎重手續選出來的。其言曰：『當第二次大會將選舉中央各委員時，凡代表連署十人以上，則得提出當選人名單，由主席團彙集此種名單，印成一名冊，其人數倍於委員名額，以之分發於各代表，請各代表詳加考覈，然後在此名冊上，擇其所欲選舉之人，加以標識，即以此名冊代選票，公推查票員若干人，監查員若干人，公開檢點，以多數者當選。此種方法有三特色：一，凡一人之見聞有限，集多數人之見聞，而加

以考覈，其選舉必更公；二，名冊只是介紹性質，而絕無強迫性質；三，名冊有空白，選舉者如不以名冊上所開人名爲滿足，可在空白上填寫他人，絕非以名冊上之人名爲限，如此則不足十人連署以提出名單者，亦未嘗侵其選舉之自由，綜上三點，則當時選舉之周詳慎重爲何如？」他所敘述的這種方法，第三屆是完全採用了的，所不同的只是二屆以名冊代選舉票，而三屆則以選舉票替名冊而已。我們只要將他上面一段文字中凡有「名冊」二字之處均易之以「選舉票」一名詞，則三屆選舉之如何提出名單，如何考覈，如何公開，如何自由，均與二屆絲毫無殊。然則二屆用此選舉法，既已「周詳慎重」矣，三屆用之，又何能誣之爲「圈定」乎？

至若汪精衛個人，僞竊一個非法的中央的名義，予智自雄，對於他的少數黨徒，純然是他個人的支配驅遣，形成了千真萬確的「個人治黨」的情景，「個人治黨」是誠然該咒罵的，但也是應該拿出咒罵汪精衛一流人，才沒有絲毫的誣罔。

再看反動政客所謂「個人治軍」之說，若以之攻擊他們這一次所依附的閻馮諸軍閥，正是切當，因爲唯閻馮才是赤裸裸的個人治軍，所以成其爲軍閥。軍閥是不知有國，不知有黨，不知有法律制度，但求擁兵自衛。這次反動政客一方面提出反對個人治軍的口號，一方面却

賣身投靠於個人治軍的閻馮諸軍閥，其所以歸於消滅，也正是必然的結果。他們初欲以此口號來攻擊介石先生，殊不知弄到結果。他們倒去仰承『個人治軍』最真切的閻馮軍閥之鼻息，而不知恥，殊不知介石先生的軍權，北伐以來，直接受之於黨，受之於國民政府，其間是法律上多重的依據，事實上是多重的信任，而且自被給與軍權以來，沒有一個兵不是為黨而用，沒有一次的征伐不是受命而行。如果這樣一種軍權尚可目之為個人的而非國家的，則古今中外直將無所謂國家正當的武力，若等而下之，像此次反動政客輩所依附的閻馮各軍閥的軍權，豈不只好當作獸權禽權論，而不得齒於人獸乎？所以此次反動政客以反對個人治軍之說為號召，不特抹煞了正面的事實，而且正是觸着了他們自身所犯的毛病。

總核前面這兩段的剖析，此次反動政客反對個人治黨而他們自身倒是深中了個人治黨的惡毒，他們反對個人治軍，而他們自身倒匍匐在個人治軍的底下，結果自歸於失敗而銷滅。個人治黨和個人治軍本來都是老早不能容許於社會的，用不着來震天的喊吶。在這一中央討逆勝利的當中，中央是以整個黨及整個國軍戰勝了個人，而此之所謂個人，就是閻馮一流，同時也是中央以整個黨及整個國軍戰勝了一切只知道有個人不知有黨國的政客，而此之所謂政客，即汪精衛一流，這一個總勝敗之間，國人應該曉得事實上已經證明，所謂『個人治黨

個人治軍』者，究是何人了。

反動政客在消極方面所以詛咒人的兩個口號，其內容的虛實如何，其所生的結果如何，既如上述矣，現在且來檢查他們在積極方面所喊的『扶植民主勢力』一個口號，又是什麼一回事。

他們說，南京方面是不扶植民主勢力的。所以他們就要喊出『扶植民主勢力』的標語來，表示他們對於民主主義具了如何的熱情，但這是無病而呻吟的。我相信凡是國民黨黨員，既沒有一個不相信三民主義，那當然沒有一個否認民主的勢力之培植，總理對於三民主義的內容和實施三民主義的計劃和步驟，已是說得偉大精深，其中由軍政訓政而之憲政的全部路線，是整個扶植民主勢力的路線，這是用不着說的，而且我們正是向着這路線努力，也不消說了，既然如此，那末，單獨提出一個『扶植民主勢力』的口號來，豈不是無病呻吟是什麼呢？但是我們檢查這一個口號的內容，他們所謂民主勢，完全與 總理的民權主義不同，他們的民主勢力，內容有兩點是矛盾得可笑，第一，他們一方面主張扶植民主勢力，而考覈其所謂扶植民主勢力的方法，就是要『組織民衆』，如此而已矣。他一方面，他們就說現在的黨員，不應該形成一個『特殊階級』，『立在全國人民的頭上』。其所主張與所攻擊，兩方面的實

際合看起來，就成了反動政客思想上一個大矛盾。何以呢？組織民衆，與組織人民不同。總理說得好：『大凡有團體有組織的衆人就叫民』，這有團體有組織的人民，是指社會上有職業有固定生活的衆人而言。他們固定的職業和生活，便是構成社會性的根本條件，亦即是形成其有團體有組織的基本條件。有了這些條件的人民而予以政治上的自治組織，使有參與國家政事的權能，這便是 總理的民權主義所要達到的目的。至於反動政客所主張要組織的民衆，是要從社會裏面攪動一般衆人出來，離却其固定的職業和生活，而專去爲一個特殊目的活動。照反動政客們所主張的作法，不過就是要組織這些民衆起來，這便作成他們所要扶植的民主勢力。從前共產黨在我們黨裏大做其民衆工作，大喊其『黨權高於一切』的時候，把所組織起來的民衆，放到一個黨部內去，喊成了的黨和造出來的黨員，就正成就了現在反動政客所謂『立在全國人民頭上』的一個特殊階級，反動政客一方面要組織民衆，一方面要反對立在全國人民頭上的這種特殊階級，自以爲是說得很好聽的而不知他們所要組織的民衆，以若所爲，事實上的結果，定是只能造成一個立於民人頭上的特殊階級，決不能造成人民當中的民主勢力。這一個大矛盾，反動政客在那兒主張一槓，反對一槓，尙以爲可以瞞得過人，這真是一個指頭遮羞。我們的見地是，反動政客要自己檢查自己過去所種的惡因，不要把自已的罪



過寫在人家的賬上，他們在武漢政府的時候，喊出「黨權高於一切」的口號，才把當時黨員立於人民頭上的惡風氣造成而蔓延起來。我們自從清黨起，一直到現在，都是在努力把這一個惡風氣漸漸糾正下來，而於這種惡風尙未完全停息的時候，反動政客却輕輕把他們自己造成特殊階級的責任推卸到旁人身上，何其卑劣若此哩！第二，他們一方面主張「組織民衆」一方面又說要「地方自治」，這也是表面句一好話，而考其實際，這兩句話是互相矛盾而衝突的。地方自治是總理的遺教不是反動派的新發明。但是總理之實行地方自治，是要每一縣的人民自己籌備而政府只是派曾經訓練考試合格的人員去協助之，並不是如一些反動政客要在地方自治體之外去組織民衆起來壓迫地方自治。總理所說的地方自治，其主體爲人民，與他們所說地方自治，其主體爲另外組織之民衆有大大差別。如果照他們的主張，要組織民衆去實行地方自治，這便是人民頭上多了一個特殊階級出來。但這却不是總理的遺教。總理是要即以地方人民組織地方自治體，絕非另外「組織民衆」去施行「地方自治」人民組織地方自治體，則自治乃人民之自治。而人民即組織於自治體之中。組織民衆去辦地方自治，則所組織的民衆乃在地方自治體之外，此種組織的民衆，最多不過是一個私法上的團體，而與公法上的地方自治體是兩個對立的組織，這是總理的遺教上所沒有的東西。所以反動派扶植民

主勢力的內容，一方說『組織民衆』，一方說『地方自治』其矛盾不相容已屬瞭然。以此矛盾，可知他們所謂『扶植民主勢力者』仍不離共產黨組織暴民的傳統思想而已。我們依照 總理遺教，只有扶植民權發展，而民權之基礎，必須爲人民自身所組織的地方自治體，決非另有同一政治性質之所謂民衆組織。總此二大矛盾之點，可見反動派以『扶植民主勢力』爲號召，表面反對人民頭上有特殊階級，而考其實際，則其所謂組織民衆之方法，正適以造成其人民頭的特殊階級。如此，則他們在口上扶植的民主勢力，到他們的手上便要不見了。這種空頭支票，不特是沒有得兌現，而且一面發出去，便一面取消了，豈不要成爲反動派的致命傷麼？

將反動派在這過去破亂當中的重要主張這樣剖解下來，我們已見其支離破碎，既已如此了，則他們的失敗，不啻反面證明全國國民的政治見解和智識，已有顯明的進步，因爲反動派除了上述消極和積極的三個口號外是沒有新鮮理論的。他們固然竊取 總理開國民會議的遺教，然而既是 總理的遺教，就不是他們的新主張。我們對於 總理開國民會議的遺教，是老早就想執行的。總理逝世後，中央在粵卽有促開國民會議的組織。在北伐完成的時候，中央的同志又有此意，卽在討桂的時候，亦有人說。但是自從革命軍從廣東出發到現在，客觀的環境不容許國民會議之召集，尤其是最近兩年來反動派接二聯三的反叛，使中央不能不

專力於戡亂的工作，遂致無籌備國民會議的餘地。所以許多人說：「國民會議之所以延至其今實在是歷次叛亂不已的反動派尸其咎的」。這些都可以證明現在一般人對於國事皆自有切合事實和道理的見解，並非任意發些空論就可顛倒黑白的，政論非凌空的高調，要切合事實，尤其不可抹煞事實，才有裨益於實際。這一點。現在的國民已有相當的認識了，所以反動派各種無理的違反事實的責難，也就無所施其搖惑。

在討逆完全勝利的今日，事實上一般國民已經公認封建軍閥，是不容存在的，國家的統一，是必要的，由革命努力而樹立的政府權力，是必須鞏固的。我們既然把國家的統一和政權鞏固了，則今後的根本步驟即在召集國民會議以確定三民主義的國勢。以前我們以黨的力量，一方面以武力克服民敵，掃除障礙，一方面以文字宣傳主義，開化人心，兩者交相爲用，至今已大體上造成國家的規模，則今後本黨，當以「總理所定的一切建國計劃，經國民會議付諸全國人民的決議，使國民得本其自身所感的需要。充分採納三民主義的根本計劃和方法，以謀全國實際的建設與發展。經此一個根本步驟之後，則三民主義的國勢，其內容與方法，即由之而確定，而此後全國人民，庶得齊一其意志，集合其力量，以從事於國家和平建設的大業。如此，則以後雖有其頑固覺的反革命軍閥如閻馮其人，亦不敢復起以與全國人民爲

敵矣。

## 國民今後之最大責任

劉蘆隱

十九年十月十日

溯民國成立至今，忽忽已十九週年，而北伐完成，亦已兩載。當此和平統一重現之日，又值十月十日國慶大典，緬維總理先烈締造民國之艱難，近念國民遭受戰禍匪患之痛苦，安民治國，益感迫切！回憶前歲開始訓政以來，因迭遭反動軍閥之搆亂阻梗，中央疲於戡亂，未能專力建設，致訓政工作，不能為長足之進展。良深痛惜！所幸叛亂已次第蕩平，穩定和平統一之局面，吾人今日紀念國慶，實具有重大之意義及無限之希望，舉凡國家之安定，政治之刷新，社會之改革，與夫本黨主義政策之具體實施等等，均已環集於國民之雙肩，值茲舉國熱烈慶祝國慶之日，特臚舉數端，以為我同胞共同努力之方向焉。

我國民慘遭軍閥之禍害，已十有餘年，自北伐告成以來，一切新舊軍閥，率由最後之掙扎而趨於敗滅崩潰，叛亂迭乘之局，庶可從茲閉幕。然一切腐惡餘孽之掃除，與夫封建積毒之蕩滌，有待於吾人努力者尚多。我國民須乘此次討逆之勝利，進而澈底殲滅反動之惡勢力

，斬絕軍閥政客禍國之根株，並改造國家精神物質之環境，使割據封建思想，無由緣附滋生，絕反革命死灰復燃之機會，措我民國於長治久安之境域。此其一。

方今民國之最大任務，乃在保持和平與統一。蓋不統一則不能暢施訓政建設；不和平則不能解除國民痛苦。中央迭次討逆戡亂，即所以爲國家求真正之統一，謀永久之和平。今反動勢力已次第撲滅，國民忍痛以待之和平統一，亦已重行實現。凡我國民，均應認識其代價之奇鉅，竭全力以保持之；其有敢冒不韙，反抗中央，破壞訓政之徒，應不待中央之討伐，共起而制裁之，鋤芟之！以民意代替武力，保障此熱血頭顱所換得之和平與統一。此其二。

國家之治亂與中心勢力之造成，實屬息息相關；苟中心勢力已成，則內足以統馭全國，外足以應付國際；亂不待平而自平，國不期治而自治。故欲永固民國，非協力造成強固之中心勢力不可！本黨爲民國唯一之中心勢力，國民均應一致擁護此由中心勢力而構成之中央政府，謀所以鞏固而強大之，庶對內促民國於治理，對外謀不平等條約之廢除。此其三。

一切新政之推行，胥賴秩序之安定；若國家不穩定，社會不安寧，則救死不暇，遑論設施？故國民務應協助政府，努力剷除殃害地方社會之匪共，消滅政治上治社會間一切擾亂秩序破壞安寧之因素，建立國家社會安定強固之基礎；使能安居樂業，暢敷新政；此其四。

年來天災人禍，相繼不絕，西北各省久苦荒歉，湘鄂贛閩復苦匪禍，冀魯豫陝則更遭兵燹，農村破產，流亡載道；加以金貴銀賤，影響全國，工商業日形凋落，舉國交受其害，我國民除竭誠贊助政府救濟流亡綏撫地方外，尤應力謀農工商生產事業之振興，共紓經濟之國難。此其五。

民生困苦之解除與民主勢力之樹立，亟待吾人共同努力者正多。保障和平統一，綏撫地方社會，僅爲解除困苦樹立民主之初步。至若澈底解除與普遍樹立，則胥賴地方自治之實施。是以推行地方自治，實爲訓政工作之重心。國民均應集中力量，協助政府，籌備地方自治，扶植國民之自治能力，發展地方之經濟事業，共促訓政時期政治經濟建設之完成。此其六。

我國文化落後，國民未受教育者居大多數；此大多數未受教育之國民，缺乏一切應具之常識，不但生產能力低微，政治興趣淺薄，且團結力量與國家觀念亦極薄弱，實爲民族前途之最大隱憂。故國民必須努力謀教育之普及，以統一國民之思想，提高國民之智識，發展文化事業，力求國家社會之進步。此其七。

抑有進者，中央近年歷次之決議，率皆切合國家民族之需要；而方案步驟亦至具體而切

實，苟無桂系馮系閻系等軍閥之繼起叛亂，則其成就必已大有可觀。現障礙已除，自當繼續努力，雖未能指日計功，然猶可循程而進。政府固應負責力行，亟謀實現，而我國民亦須各盡其知，各獻其能，相與革新社會，修明政治，期全國得早日享受三民主義之實惠。此其八。

綜上萃萃諸端，皆我國民今後之最大責任，亦即中央政府訓政時期全力以赴之中心工作；所望全國國民，認清對國家社會責任之重大，痛革歷史遺傳之惰性，振起民族創造之精神，誓以堅毅之決心，在政府領導之下，羣策羣力，突破一切困難，共向心理社會政治物質之建設目標而邁進，以完成訓政建設之大業！國家統一和平之基在此，民族之繁榮在此，而國民之樂利幸福亦在此。願我同胞於熱烈紀念國慶之餘，共循斯旨，協力進行，務期貫徹！則以後之國慶，必勝於今日之國慶萬萬也。

## 民治基礎之建設

孫科

十九年十月十日

自總理首倡革命，經二十餘年之奔走，十餘次之失敗，始有辛亥武昌之起義，達到推

翻帝制，創立民國之目的，願民國建立以後，清廷之遺臣，以及新興之軍閥政客，接踵而起，相尋竊國，自是內戰綿延，迄無寧歲，而國運机隍，民生凋敝，以視清末，殆有過之。總理以革命之目的未達，乃團結同志，繼續奮鬥，用圖肅清反動餘孽，建立真正民主之國家，於是再經十餘載之努力，始有民國十七年之北伐成功，統一中國，不幸，總理已先去世，未及親見其盛況，然其在天之靈，當可稍慰矣！當此之時，吾黨同志，方額手稱慶，而全國人民，亦莫不歡忭鼓舞，延頸企踵，共冀軍事之告終，訓政之開始，誰意兩年之間，反側軍人，叛黨份子，變起肘腋，禍生不測，中央爲削平叛逆計，不能不復用干戈，際此次閻馮張桂聯合稱兵，反動勢力，遂登峯造極之境，幸中央剿撫多方，將士用命，歷數月之征誅，反動勢力之聯合陣線，先後崩潰，今東北出師，收復平津，晉豫殘敵之收拾，易於反掌，吾人於國慶佳期重覩和平，良足慶幸，然語有之『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凡我國民，痛定思痛，不能不有澈底之覺悟焉，間嘗考之，中國之所以不能於辛亥一役，建設鞏固之民治政府，實行三民主義者，雖因軍閥之專橫，政客之搗亂，而其實則軍閥之所以能專橫，政客之所以能搗亂，乃由於民治基礎之薄弱，社會環境之惡化，有以致之。是故欲求中國內亂之永戢，三民主義之實現，必須確立民治之基礎，樹建民治之精神！然後反動餘孽，無從寄生，革命障礙



，始能掃除，否則梟雄狡獪之輩，鬼蜮萬端，玄虛百出，捲土重來，固意中事也。當此一陽復始百廢待興之日，吾人必須足踏實地，以堅卓絕之精神，百折不撓之毅力，樹立新中國之民治基礎。此基礎為何？一曰心理基礎；二曰物質基礎；三曰政治基礎；三者既備，而後國民革命之目的，乃能實現，三民主義之成功，可立而待矣。

何謂心理基礎，心理基礎者，謂全國國民應一致受三民主義之洗禮，務使全國國民，不但了解三民主義之涵義，且能誠信三民主義為惟一之救國方策；同時並有實行三民主義之決心也。欲達此種目的，必須確定三民主義為全國教育之中心標的，並以十分誠意，勉力於此種方案之實施，然後全國青年之思想，乃不致誤入歧途，陷於徘徊紛擾之狀態。迨全國青年之信仰，既已堅定，在消極方面，則外來煽惑，不易動搖；而在積極方面，則由信仰即能發生雄厚之能力，此種能力，蓋即推進主義之原動力也，自吾黨統一中國以來，在名義上，亦曾注意及此，惜實際上所生效果，至屬輕微，青年之思想，靡雜凌亂，不減疇昔——長此以往，危機之大，莫此為甚。此為目前所當策羣力以赴之者一也。

其次為物質基礎之建設。中國為產業落後之國家，國計民生，上下交困。加以天災人禍，人民之流離失所者不可以數計。此輩於饑寒交迫之際，不流於匪盜，便投入行伍，職是之

故，軍匪之增加，遂成正比例。邇來共黨潛伏，到處煽動聚嘯游民，蔓延各省，實爲中國心腹之患，然肅清之計，專賴武力之誅剿，殊難根本消滅，最良方法，厥爲民生問題之解決。故吾人必須於最短期間，依照 總理之實業計畫，開發農礦工商各項實業，然實業之開發，首在交通之便利，故鐵道公路，又爲開發實業最重要之工具。以中國幅員之廣，人口之繁，全國鐵道，僅得七十英里，平均每二百七十六英里，或五萬五千人口，始有一英里之鐵道，較之任何國家，其比例均爲最小，又何怪寶藏之不興，國民經濟之窮困乎？是故 總理十萬國較英里之鐵路計劃，必須促其實現；然後農礦工商各業，乃能以次發展，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要素，乃能有圓滿之解決，管子云：『衣食足，而後禮義興，』生活安定，雖欲驅人民爲盜，亦不可得矣！豈復有挺而走險者乎？此爲目前所當策羣力以赴之者二也。

復次爲政治基礎之確立，政治者，乃爲人民而設，非人民爲政治而有也，政治之目的，在謀全國人民共同之福利，然以往之軍閥政府，不獨在積極方面，不能爲人民興利除害，而在消極方面，亦不能保障社會之安寧，適足以增加人民之負擔與痛苦而已。吾黨之實行國民革命，其目的在求政治爲民所有，爲民所治，爲民所享，視此訓政時期必須剷除一切吏治之陋習，蠲免一切苛捐雜稅，同時對於人民之權，務期早日實施，使全國耳目，爲之一新。然

後全國國民，始能感覺國民政府之所以肇於軍閥時代之真意義，同時對於本黨之主義政綱，獲得深切著明之認識。苟吾人不能於預定訓政時期內完成訓政工作，則人民心目中，將不認三民主義，不過爲不兌現之鈔票而已。吾人又將何以自解乎？此爲吾人目前所當策羣力以赴之者二也。

以上三者實爲民治之基礎，亦即實現三民主義之基本條件。此三種基礎之建設，雖未能一蹴而幾，然苟能以總理百折不撓之堅忍精神，剷除一切虛僞之惡劣根性，則其道固不在遠也。此則視吾黨同志有無決心與誠意而已耳。今當閻馮張桂，先後肅清，全國復歸一統之期，全國人民，對於吾黨，俱懷無窮之期望。願吾黨同志，急起直追，以慰喁喁之情焉。

## 軍民分治黨政合作

陳銘樞

十九年十月二十日在中央紀念週講演

同志們，中國空前的大戰已經終了！這次大戰把中國的革命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我們不應輕意的忽視這個空前的犧牲，我們要了解這次犧牲所給予我們的教訓，并且確定今後的努力。

這次大戰所給予我們的教訓最重要有三點：

這一次大戰是殘餘軍閥最後的一個迴光返照的總掙扎。當變亂初起的時候，氣勢非常可怕，不但北方的馮閻，將若干年的準備拚着孤注一擲，南方的惡勢力張桂及共產黨的亦乘機蠢動。在這一次腐惡勢力總攻之下，勝負之數，實在很難判斷。而蔣總司令抱着革命的忠勇和百折不撓的精神，忍受着平常人不能忍受的痛苦，在前敵督師，卒至把一切敵人克復下來。敵人的兵力比我們多，砲火比我們利害，在軍隊數目上比較，我們似沒有戰勝敵人的把握，而我們的軍隊能夠受着蔣總司令的忠勇的指揮，把敵人克復下來的原因，就是在我們是主義的武力。我們的將士都受過主義的訓練，敵人軍隊是為個人而戰，我們的軍隊是為主義而戰，所以這一次的大戰，是有主義的軍隊，克復以個人為中心的封建武力的一個榜樣。革命的忠勇精神是無堅不摧，為主義而戰的武力是無往不勝，這是大戰給與我們的第一個教訓。

這一次的大戰，差不多和歐戰一樣的一個陣地戰，這樣陣地戰在中國是空前。戰鬥的中間，有好幾次我們的一部分過隊是瀕於危險，就是在歐戰史上看來，遇着這樣的形勢，非投降不可，而我們的隊伍，能夠仗着剩下一槍一彈，亦要犧牲的精神，在歐戰也很少見到。於

此我們得到一個自信，中國人民的勇敢，實超過於外國人，將來加以科學的訓練，和近代最進步的海陸空軍的設備。我們決可以防止一切帝國主義武力的侵略，進而可以用我們的武力，保障世界的和平，這是這次大戰給我們的第二個教訓。

第三這次戰爭，馮閻以若干年的準備腐惡勢力作浩大聲勢的聯合，結果還是這樣的慘敗，以後還有誰敢作意樣的妄想，來與中央對抗？以後還有誰敢輕啟戎心，甘願嘗試一個必然的犧牲？在中國歷史上看來，從一個朝代轉移到別一個朝代的時候，中間自然要經過大的混亂，在這大混亂之中，大家都覬覦一個僥倖的勝利，來爭王稱帝，攀龍附鳳，不到新朝的威力使人無可僥倖的時候，混亂是不易中止。現在不是那時代了，現在是由個人的政權轉移到革命民衆的政權，而那些封建份子還抱着換朝代逞英雄的思想，所以屢蹶屢起，總要作僥倖的一試，這一次大戰，以主義的威力，削平叛亂，絕其僥倖覬覦之心，這是一個最嚴重的教訓。并且這次驚心怵目的犧牲，參加戰爭的將士之中，縱然有抱着野心的人，也不敢再來引起戰禍，一般鼓舌如簧撥弄是非的政客們，亦不敢冒全國民衆的大不韙，來重造一次可怖的犧牲。所以這一次戰爭的教訓，可以防止戰禍的再起，這是一個空前的戰爭，也就會成爲最後的戰爭。

總之這次大戰，所獲得的勝利，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不是內戰，是中央政府克服叛亂。不是某系的武力打敗別一系武力，是革命的武力，肅清一切腐惡勢力的殘餘。更進一步，我們便可以得出一個原則的自信，誰反對中央，誰就得失敗，誰破壞統一，誰就是自取滅亡。

但是在危難的時候，我們要有革命的自信，到勝利的時候却要有革命的警惕，不自信，不能獲得勝利，不警惕，不能保障勝利。蔣主席在前方受了絕大的危難，終於毫不動心的得到勝利便是由於他的革命的自信。現在是勝利了，同志們大概多是抱着樂觀，但這絕不是可以樂觀的時候，我們在政治上若辨別不清道路。一陷于錯誤，歷史的循環是會送來一次更大的流血，更大的犧牲。我們應該把中國民族送上一條平等自由的康莊大道，或者會把牠送入萬劫不復的十八層地獄，目前就是一個絕大關頭。同志們我們對這個關頭一絲一毫放鬆不得，這不僅是對不住死者的問題，而是本黨的存亡問題；不但是本黨的存亡問題，而是中國民族的發皇或絕滅的問題。於是我們就得談到我們今後應有的努力了。

銘樞本是一介武人，對於這樣的重大問題，那能發表什麼創獲的主張，今天是就平日從黨國先進處受來的教訓，作一個很鄭重的轉述發揮。

我們今後應當如何努力？我願意將從胡展堂先生處聽來的兩句話，做一個總解答。前幾天蔣主席在公館裏同胡吳李蔡諸先生談論，今後黨政的辦法，胡先生提出八個字：關於「軍民分治，黨政合作」，這八個字就可以解答這個問題。關於軍民分治的意見，銘樞聞中央諸先進的訓導，所以在桂系未叛亂之前，就會經疊向中央痛陳利害，那時李宗仁還當面罵我唱高調。他說：「我以為現在非軍人專政不可，文人是什麼東西？」我當時只好付諸一笑。那時也許是時機未到，言之過早，所以在政治上沒有發生多大的影響。去年編遣會議決議「在役軍人不得兼任省政務官」，也因格於事勢而不能實行。這一次削平叛亂，是絕好時機，朝野人士都應該非常重視這個關頭。銘樞在雙十節發表一篇感言，亦愷切重申軍政分治的理由。

軍閥的特質第一是有特定政治區域做他的勢力範圍，第二是有特定的軍隊受他的指揮。假使軍人不同時掌握政權則給養仰給於中央，不能直接取之於特定的政治區域，再劃分軍政區域，依國防及國勢劃分軍區，依行政之便利，及歷史的習慣，劃分政區，二者不混，則軍人不但不能「專政」而且不能「制政」。軍閥的第一個特質，就完全消滅了。軍區劃分以後，確定師爲單位，漸漸的將各個軍隊在一定期限內，作部分的相互調防，然後軍官僅爲指揮

軍隊的工具，而士兵無効死私人的心，「將不專兵」則軍閥的第二個特質消滅了。所以這兩個辦法實行，便能一勞永逸地剷除軍閥的根基。總之軍政分治，是打破「以軍專政」的成例；軍政區域劃分，是免除「以軍制政」的危機。政治不爲軍人所把持，則政權絕對的集中；軍人沒有特定的統治區域，沒有特定的軍隊，則軍權絕對的集中。

或者有人顧慮這是行不通的高調，我以爲這絕對不難見諸事實。革命的將領們抱着犧牲的精神，爲革命死鬥了多少年，豈有不重視其出生入死所換來的勝利之理，當初可以犧牲性命去掃除革命的障礙，現在何難將用之於戰陣中犧牲的精神，來以身作則，犧牲一己的小利，保障永久的和平，樹立萬世的風範！還有一點應當特別提出來說明的，就是所謂軍政分治，是就制度言，不是就人言。軍人中也未嘗沒有深明治體的人，若是解除軍職，亦未嘗不可担負政治的責任。不過就銘樞個人的經驗，兢兢業業的試驗了幾年，總時時覺得自己學識的不夠。對於這非常複雜的政治，時常覺得應付不了，比較我從前治軍是有百倍的困難的眞非有專門的學識和經驗的人，不能担負這個責任。本來現代中國的政治，不同中國古代，政治：從前是簡單，現在是複雜；從前是使農村安定了就夠，所以消極的不擾民便是好官；現在是不但要顧到一省，還要顧到一國，還要顧到國際。現代的中國政治，又和歐美資本主義國



家不同，他們秩序建立了，只要肅規曹隨就成，中國是要建立新的政治，在古今中外都沒有。所以在我學習得來的經驗，要勉強担负省政的一部分，或許能盡心力爲之；主持省政，實在是隕越。所以我覺得軍人來担负政治，總是不容易的事情。

至於黨政合作這一點，是這一次才聽胡先生說的，胡先生還舉廣東爲例，說廣東黨政間沒有糾紛紛緣故，就是由於黨政合作。關於這一點，因爲我在廣東的環境裏面黨政間的關係，不成什麼問題，所以沒有考慮到在原則上黨政是應當一致的。黨的政策，是要通過政治來表現的，而政治的設施，是要黨在後面推動的，這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黨政合作，如果成了一個問題，這已經表示現在的黨和政發生了毛病，不是因爲有些地方的政治，沒有走上黨的軌道，便是有些黨部的工作方向有錯誤。在秘密工作的時候，黨部力量的表現，在乎反對政治的現狀，也許有些同志在現在也以爲反對現狀是表示黨的力量，所以便發生黨政不合作的問題。殊不知現在的政治，是黨的政治；黨的力量，要在政治中表現，而不是在政治外表現。黨的政策是要通過政治來表現，而不是從干涉政治來表現。黨政間既然有些地方發生了這樣的毛病，應當急切的救治。胡先生所提出的「黨政合作」的口號，就是救治這個毛病的藥劑。

以上是說明黨與政治間的關係；黨與民衆間的關係，也應明瞭。關於這一點，我很誠懇的介紹吳稚暉先生的教訓。吳稚暉先生說：『所謂訓政，推 總理的意思，是像周公訓成王以政一般，周公在任務上雖然是師傅，但在地位上仍然是臣僕。』這個譬喻，是最精當沒有了。這樣的訓，才是義務的訓，而不是爲權利而訓。現在辦黨受同志，每每有一種很錯誤的觀念，擺出做師傅，甚至於做主人的架子，享一切做師傅或主人的權利，而義務是一點也不盡的。本黨在興中會同盟會時代，黨員對黨的主義，並沒有普遍的認識，黨的組織與訓練，並不嚴密；但革命精神是非常的蓬勃，就是爲那時的革命是義務的而不是權利的。同志們！在現在應當恢復義務的革命精神，去訓導民衆，所以黨員與民衆間的關係，黨員是要盡師傅的義務，但仍然維持臣僕的地位。

這幾年來下級黨部的糾紛很多，這些糾紛的總源泉，都是因爲權利問題。黨政間的糾紛，固然有些是因爲下級政府不理黨部，也有些是因爲黨部沒有得到私人的利益，而干涉政治。黨部內的糾紛，假使甲方是因爲爭主義，那乙方自然爭權利，這就是說至少有一方是爲爭權利，如果黨部只有義務，沒有權利，那就沒有什麼可爭了。即使有爭，是義務之爭是見義勇爲，那是最好沒有的現象。所以下級黨部的生活費，應當減少到最低限度，最好是變換類

同做官的機關，而爲責成履行義務的黨部，並且不要以辦黨爲職業，而要以有職業的人來辦黨，所以吳先生這個主張，是救黨的唯一辦法。

軍民分治，黨政合作，及恢復義務的辦黨精神，這都是在這個革命的新的階段內，黨政軍三方面措施的原則。但目前還有一個最急切的問題，沒有談到。這一個問題解決，才減少黨政軍措施的障礙，這就是肅清匪共的問題。這個問題在蔣主席的電報和宣言中，已經說得非常痛切。對於完成這個任務，中央是有十二分的決心與把握。第一是前敵的戰事已告結束，將凱旋之師調回來除此蔓延之患，自然不成問題，第二是全國民衆對共產黨的深惡痛疾一定全力來幫助中央的軍隊，肅清匪共的根基。不過在肅清共黨的期中，與將來的善後，有兩點應當特殊的注意，在戰爭的時候，除了手執紅旗，荷槍實彈，來作戰的罪在不赦以外，軍隊所到之處，應當赦免脅從，一切不咎既往，更不可深文周內，含恨殺戮。因爲在共黨威力之下，脅從的人很多，如果嚴加追究，是堅其爲共產黨之心，以俸免於死。至於善後，則在乎有現代頭腦的地方官吏，兵力肅清一縣，馬上在這一縣就得設置賢明的縣官。保障農村的安定，共產黨自然永遠不會發生。假若縣長不好，在匪共蹂躪之後，加以暴虐貪污政治的壓榨，便加緊農村的崩潰，供給共產黨以復活的基礎。

目前這關頭實在太重要了，若能打開這個局面，中國民族就是一條活路，不然就是一條死路。我在這一關頭，是喜懼交集，所以嘮嘮叨叨的說了這許多，不過這些都是僅就黨國先進同志的意見，加以發揮，希望同志們加以嚴重的注意。同志們！在這個重要的關頭，我們不要鬆懈了我們的努力，前敵死難的將士，是在用血與肉督促我們中國的民族；生死存亡，是在等着我們的努力而決定其運命。同志們！這個時期，我們的責任，是何等的重大呵。

(完)

## 過去的反省與建設的基礎

邵元冲

十九年十月十日

這幾年來，國民所唯一的希望，就是戡亂求治，經這一次掃除反動勢力以後，關於戡亂的工作，已可相當告一段落；那末在求治方面大家就應該使它積極進展了。本來戡亂是求治的手段；求治才是戡亂的目的。我們現在一定要把求治工作在政治方面建設方面有相當的表現；然後亂的源才可永遠杜絕，以前一治一亂的形勢，才可永不發生。而國家社會才能走上設的軌道。

但是求治的工作，怎麼樣能夠表現它的效能呢？最重要的兩點就是無論黨的工作，或政治

的工作，都應該合乎黨的主義；和能夠適應人民的需要。如果，黨政的工作，違反主義，我們固然不應該去做。就是人民還沒有感覺到需要的工作，我們也應該斟酌緩急，不必無目的的亂做。而且所謂人民不需要的工作，實在就是不合主義的工作。因為主義的作用就在合乎人民的需要而求解決的方法，不是空洞用主義的名詞，作宣傳資料的，我們看過去的幾年，黨政方面負責的同志，也未始不盡了相當的努力，但是為什麼社會的紛亂會依舊層出不窮，民衆和黨部或政府還是不能接近。這些原因，固然，一方面是由於反動勢力在那裏搗亂；同時也因為在黨和政治的負責同志方面沒有很切實認識民衆的需要，做了不相干或非必要的工作，也是不能辭其咎的。因為這些工作，不能使人民了解，不能得人民信仰，當然得不到人民的贊同和協助，才形成工作是工作，民衆是民衆，完全分成兩極的現象。所以現在我們要使黨和政治的工作，能夠積極進展，就要拿主義做標準同時切合於人民的需要。例如這幾年紛亂的結果，人民感覺到秩序不安，交通阻塞，和金融停滯的痛苦，非常大。我們就首先應該安定各地方的秩序恢復交通，活動金融，這樣人民既能解除切膚的痛苦，自然可以各安其生，各樂其業，則人民對黨部和政府的信仰自然日益深切，將來黨政方面工作的效能也一定可以積極發展。黨政方面的工作能夠發展，使民衆走到一條路上來，通力合作，紛亂的根源

，可以不再發生，建設的基礎也從此可以隱固了。

現在我們站在三民主義的立場上來講，我們第一要認清過去的一切錯誤，以後的努力應該力求適合於整個國家人民的需要，對於建設的着手次序，可以分成兩點來注意。

第一就是要努力於全國人民的心理建設，來打破過去的個人主義和反動思想，恢復中國固有的倫理思想。但是這種心理建設不是僅僅用文字和講演的空泛宣傳，所能發生效力，一定要普遍發揮它的意義，腳踏實地的做去，才有成功的希望。要使心理建設切實而普遍，就非從教育方面着手不可。過去的教育，因為方針不定，不但沒有發揮教育的效能而且發現了許多弊病，我們看過去幾十年中間，因為在一個時期，拚命模倣日本德國的軍國民教育，就造成後來一班專事內亂的軍閥。因為在一個時期，拚命傾向歐美資本主義的教育，才養成社會上一班專求發展個人利益的個人主義者。因為在一個時期，拚命迷信馬克斯的唯物史觀，才造成現在一班殺人放火的土匪強盜，這種風氣所趨，大家都是只知自私自利，損人利己，而把中國固有國民性的美德，漸漸遺忘而至於消滅。因此人人只知為自己謀而不知為公共打算，一切個人注意，地方主義，部落主義，以及小組，派別，都在那裏發榮華長，釀成現在這樣紛亂的情勢，因此大家要切實的反省和覺悟，就是要知道求整個社會進步，和大多數

人民的福利，一定要恢復中國向來的博愛精神，使全社會一切的人所有聰明才力都集合起來努力，求整個社會和人羣的進步與繁榮，但是要發揚這種精神，一定要在教育方面努力，從小學以至於大學去訓練一班青年，養成一種重義輕利的精神，薄己厚人的心理，大家才能想到怎麼樣求社會大多數人的福利的進步。所以心理建設如果不從教育方面着手總是偏而不全，不從青年方面着手，也決不能基本的完成心理建設的工作。現在這些搗亂反動份子在這十年或幾年前何嘗不是一班受教育的青年，不過因為他們受教育的時候，沒有樹立心理建設的基礎，才拋棄了中國和外國教育一種種長處，而只接受了種種短處，結果就不知不覺變成了擾亂整個國家社會的惡勢力，現在如果不從在教育中的青年方面來謀補救，那末現在受教育的青年。又是將來擾亂社會的原動力，天天要想戡亂，反而在那裏製造亂源了！所以現第一件事就應該從教育方面，澈底完成心理建設的工作，杜絕亂源，養成一班優良的青年，作為建設國家根本基礎。

第二，除了心理建設以外，我們同時對於物質建設，就是經濟建設，也有特別注意的必要。講到經濟建設因為中國是農業國家，就應該注意到發展農業，改良農村，改善農村教育等工作，使他切合中國的實際需要，中國的農民，確實是勤儉耐勞，為其他民族所不及，不

其弊病就是頑固守舊，不求進步。因為教育方面沒有普及，以致農民智識不能進步，農業不能改良，因為農村經濟沒有靈活，以致農民生活非常困苦，如果此後把地方秩序安定以後，最先就要把農村經濟設法救濟，將農業信用合作消費合作等事業，積極提倡，那末農民就可以得到經濟上的援助與周轉，其次再注意到灌躡普通常識，衛生道理，以及改良風俗等智識，才可使他們在經濟問題有相當的解決之下，可以過比較舒服的生活，並成為健全的國民，同時對於農產方面也可以力求改良和發展。農產能夠改良和發展，國家經濟可以不再搖動；國家經濟的基礎穩固，才可以求工業的進步，和科學的發展，而步步前進了。

我們要從教育方面，切實完成心理建設，恢復中國固有的美德；要從經濟方面，積極求農業的發展和改良，穩固中國國民經濟的基礎；然後才可使整個社會，大家都安生樂業，大家都能合作互助，把一切鬥爭侵奪的心理，消滅盡淨，所以我們對對戡亂求治，要認清亂的源和治的本。亂的源就是不治；治的本就是要從心理建設和經濟建設兩方面去做，努力於合乎三民主義及適應人民的需要的工作。大家從這倆方面努力去做，一定能收到偉大的效果。

在整個的中華民國和中國民族範圍之內，凡是一切發展和進步，統是全社會中每一個人的幸福利益的增加，所以大家應該通力合作的來求進步，不應該此疆彼界的自生阻礙。同時



我們也應該覺悟到祇有心理建設與物質建設的成功，中華民族纔能長治久安，中華民國纔可確立於世界。我們祇有仗着堅定的意志，博愛的精神，披荆斬棘的勇氣，來貫徹始終，爲三民主義來努力，求三民主義之澈底實現，一切毒蛇猛獸的反動勢力才能澈底掃盪，使青天白日的光明永遠朗照於大地。

艱難締造的中華民國，現在已到第十九年了，過去的時期，我們已戰勝了種種的困難，未來的時期，我們尤應創造光榮的歷史，全國國民大家努力吧！

## 中國之經濟建設與農業政策

邵元冲

在中國經濟學社第七屆年會演講

「經濟」二字的涵義，本來很廣：就是關於經濟事業的範圍，也是非常廣闊，凡是社會上任何事業，以及人生的任何行爲，都可以包括在經濟活動範圍之內。經濟的範圍，既然這樣廣闊，究竟從何方面着手，才可使經濟生活，更加切合於人生，才可使人類的生活，更能進步滿足？關於這一點，由於各人的主觀點不同，研究出來的結果，也就大相懸殊，而對於經濟的政策，也就分了許多學說：有的主張工業立國，有的主張農業立國；有的主張商業立國，還有的主張其他種種方法，來創造經濟的基礎，建設國家社會的經濟。

世界上各國的經濟政策，既然這樣複雜，那末我們以中國現在人民的地位，和社會環境的需要來看，究竟採用那一種爲最適宜，然後可以解除或是減少現在一般人的生活痛苦，增加他們的幸福利益呢？講到這一點，就使我們想到 總理孫先生所說的民生主義，就是要解決一般人最基本最亟需的衣食住行種種問題了！我們一定要從這幾點來定出一個方案，才可使眼前人民的生活問題，有的當解決，才能規定中國經濟政策的一個最重要的標準。

在過去幾年中間，中國國民黨的各屆全國代表大會，以及去年的二中全会，對於經濟建設問題，都有具體的討論，討論的結果，大家不期然而然的都特別注意到中國將來的農業建設問題。講到農業建設問題，往往會引起多少人的懷疑，以爲現在已是工業時代的世界，各國都特別注意到工業化，至於農業時代，似乎已成爲過去的名詞了，如果現在還是要來講農業政策，不是有些倒退和落伍的情境嗎？其實這些都是似是而非的話，我們知道無論任何國家社會固然在現在的時代中間，不能不注重工業，但惟其要注重工業因此更不能不注重農業。因爲在理論方面講來：工業是以製造物品爲原則，就是把許多原料品，成爲製造品，但是原料品從那裏來呢？大部份還不是要靠農業方面的產生嗎？所謂『農以生之，工以成之』定由農業產生了許多原料，才可以供給工業製造的用途。決不是單講工而不講農，工業就可

以發展的。同時農業產生原料，一方面固是幫助工業的發展；一方面我們人類的生活所需，更是完全取之於農產，所以我們要知道，現在各國科學無論怎樣進步，工業無論怎樣發展，只能說偏重工業，不能說完全拋棄農業，只能說有許多國家環境不允許發展農業，不能說有了工業，就可以不講農業。如果我們再在事實方面來看，更可以證明上說的不謬。近代各國的情形，究竟怎麼樣呢？像美國是一個工業發達的國家。各種工業製造品，產量很大，但在農業方面說起來，同時也可以執世界的牛耳。美國對於農業科學的研究，種了肥料的選擇，以及一切農業器具的改良和進步，都是各國所望塵莫及。決不是靠了工業的發達，就可以不注重農業。所以美國現在靠了地大物博，農產豐富的特點，再去發展工業，真是互為利用，相得益彰了！

我們再看到歐洲方面，法國的工業很發達，但是農業方面的進展，也是非常厲害，至今還保持農業國的基礎。還有丹麥國，因為能利用農產的豐富，發展農業合作，雖然面積不滿中國的半省，而農業畜牧的交易，却非常偉大。即照一九二八年的統計而論：單以豬肉，雞蛋，和牛油三項，輸入英國的銷數而論已值三萬萬克郎。以丹麥這樣一個小國而有這樣大的農產輸出量，也可見其農業成績的進步了。至於英國的情形，本部三島，面積很小，固然對

於畜牧方面，如羊毛的培養，也非常發達；但是對於其他農產品，確是不能以本部的生產量，供給本部人民的需要，更不能供給本部工業原料品的需要，因此英國也決不是只注重工業就把農業放棄，還是找到了許多殖民地來補足，成爲一個大不列顛帝國，使工業農業都有儘量發展的可能。

最後再看到亞洲的日本，也因爲地域很小宜工而不宜農，但是他們一方面在本國國內，除了平地種種農產以外，就是山谷之間，也去儘量墾殖，所以我們到日本去觀察，因爲他們把山逐層削平來增加農業種植地的面積，因此往往看到許多山谷都成爲一層層的梯形階級的農田了。同時又因爲本國產量，總是供不應求，於是不但在他的殖民地內，設法補充，還要侵略到我們中國的東三省等地方。據一九二八年的調查，日本在朝鮮經營農產的總額達十萬萬二千萬元。這也可見他們對於農業的成績了。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世界各國的情形，提倡農業，並不是倒退或落伍。農業始終是建立國家的基礎，像美國法國工業發達，同時靠了土地廣大，還是竭力提倡農業，像英國日本爲地力所限，只能偏重於工業；但也並不是不想發展農業，還是要到國外來找殖民地，作爲原料的生產地補助自己的不足，凡此種種都可以證明農業對於國家社會的重要，決不能漠然視之。

的。所以法國有名的政治家說：「對於國家經濟的政策上來講，我們現在應該發展工業，但是決不能因為要發展工業，就來犧牲我們的農業，」這種了解確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拿無錫一地方而論，無錫現在是全國一個重要的工業區域，工廠這樣多，生產成績這樣好，都可為全國的表率，但是我們看無錫最主要的工業，就是絲廠紗廠和麵粉廠，而這三項工業的原料，繭棉麥是不是都仰仗於農業的生產，假如無錫工業天天在那裏發達，工廠天天在那裏增加，而工廠所需要的製造原料，竟沒有充分供給，試問能不能站得住呢？能不能依照理想的計劃去發展呢？所以在工業方面着想，如果要工業發展，就決不能犧牲農業。

再講到農業對於人民生活的關係更是重要。人民一切生活所需要的東西，完完全全靠農業生產的供給，如果大家不注意到農業人民的生活，可以說完全無所依據，這一點我們也只要看歐戰時德國的情形就可以證明，德國在歐戰開始時利用兵器的進步和工業化學的發達戰事非常勝利；但最後竟免不了一敗塗地。這種失敗，並不是兵力不如人，也不是戰略不如人，完全因為人民生活困難所致，當時協約各國採行封鎖政策，使各國的糧食，不能運入德國，而德國本身的生產既不足。各種代用品又是供不敷求，由於糧食的饑荒供搖動軍事，以至於失敗，假如德國當時有很大的農產地，自己的糧食生產，能夠供給全國人民的需要，那末德

國一定還可支持下去，甚至可以得最後的勝利。所以在人民生活方面看來現在立國的趨勢，雖然注重工業實際上農業還是國家的基本。

但是以農業立國著於世的中國現在究竟怎麼樣的情形呢？我們如果拿歷年的海關貿易報告冊來看很可以使我們心驚，使我們覺得前途的危險！現在我們就拿民國十七年從外國輸入關於食料方面的貨品來講，重要食料品的輸入，共計二萬萬六千九百多萬海關兩，其中包括

糖	九八，六九七，九二三兩
米	六五，〇三九，二三二兩
麵粉	三二，八〇一，九三六兩
糧食	二九，八三〇，四六四兩
海介海味	二六，一二五，八四三兩
葷食品等	一七，三四三，一一一兩

以上這些貨品，是我們每天生活所必需的。所謂吃飯問題，在我們農業國家，理應自給自足，現在却還是不行，豈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又像每人生活所必需的衣料品在民國十七

年中由外國輸入的，竟有三萬萬七千一百多萬兩。其中包括：

棉貨

一七三，三五九，三二二兩

棉花

六七，九八一，四一七兩

毛織品

四八，三三〇，七九九兩

絲貨

二八，八二四，七七五兩

絲紗

二二，九〇二，一〇一兩

皮類

一六，七〇六，六一六兩

皮類

一二，四五四，七九八兩

此外如重要住料品的輸入有五千八百多萬兩，重要行料品的輸入又有四千四百多萬兩。在這種情形之下，住行方面姑且不講單拿衣食兩項而論，就有六萬萬兩以上的輸入。一個農業國家，別的工業製造品不如人不能和人家競爭，猶有可說；但是對於衣食所缺乏的數量還是這樣大，試問又有何說呢？一旦國際發生戰爭，或是中國和外國打仗或交惡的時候，只要外國封鎖了中國各口岸中國就不但工業品沒有方法購求，就是一年需要外國六七萬萬兩的衣食原料品，也是來源斷絕。結果，中國不必在戰事上，外交上爭勝利，在國內已可使幾千萬

民凍死餓死了。中國處在這樣的環境中間，實在非常危險，農業國家而失掉農業的基礎，如果還不想方法去求解決，優勝劣敗，怎樣還能生存於世界？所以我們別的問題，如科學工業等等，姑且可以拿財力不及來推辭，但是對於人民的吃飯穿衣問題，就決不能遲緩，決不能不加注意的，一定要大家來講究中國的農業問題注重農業經濟的發展和進步，才是真正救國救民的方針。

現在再來看農礦部報告十八年度全國各種重要農產物輸出入的數量。如稻米一項：輸出量共計二萬八千四百五十三担，輸入量共計九百零一萬七千四百九十七担，輸入超過有八百九十八萬九千零四十四担；又如小麥一項：輸出量共計八十萬二千一百八十五担，輸入量共計五百六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八担，輸入超過又有四百五十六萬一千六百八十三担；再如棉花一項：輸出量共計五十一萬一千二百三十二担，輸入量共計二百五十三萬零四百二十八担，輸入超過又有二百零一萬九千一百九十六担。米麥和棉花的輸入超過量竟有這樣大，送到外國去的金錢，又是幾萬萬兩。年年送出幾萬萬兩到外國，送不到幾年，中國財源，一定輸送盡淨，那裏還能辦建設，那裏還能興工業呢？

但是我們看中國各地方農民的數目，究竟有多少呢？當然，中國戶口調查，還沒有辦好



不能得到真確的數字。現在姑且拿幾個省份來代表得到一個大概的平均數。譬如照這幾年的調查，根據立法院的統計，農民戶數佔人口總戶數的百分數如下表：

河北	百分之八六
山西	百分之八三
遼寧	百分之八二
熱河	百分之八〇
江蘇	百分之七九
察哈爾	百分之七八
綏遠	百分之七五
浙江	百分之六九

其中最多的是百分之八六，最少的是百分之六九。如果平均計算，總在百分之七五到百分之八〇之間。照這種比例，中國農民就佔全國人口總數中的絕對大多數，農業生產量，自應豐富，爲什麼還要從外國輸入大量的衣食原料品呢？

對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先舉幾個例來看：如江蘇省的農業，以糧食一項而論，照平常每

年的產量，大概如下表：

稻	八，六八九，〇〇〇，〇〇〇斤
小麥	五，五五一，〇〇〇，〇〇〇斤
大麥	三，二〇七，〇〇〇，〇〇〇斤
梁高	九一〇，〇〇〇，〇〇〇斤
玉米	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斤

以上二項和其他雜糧共計一八，九一〇，〇〇〇，〇〇〇斤。如果把其中十分之一用作種子，就可有一百七十萬萬斤的糧食。供市場的需要。江蘇全省人口約計三千五百萬。如果以每人每年需糧食四百斤來計算，共需一百四十萬萬斤，那末除了這些自用外，就可以多餘百分之十六的數量，或是屯積，或是運到鄰省去出售的。

再看浙江省的情形，關於每年糧食的產量，約如下表：

稻	八，二八七，〇〇〇，〇〇〇斤
小麥	一，一七四，〇〇〇，〇〇〇斤
大麥	五九三，〇〇〇，〇〇〇斤

以上六項，和其他雜糧，約計一〇，三六五，〇〇〇，〇〇〇斤，如果也扣去之一的種子，再拿全省二千三百萬人口，每人每年需糧四百斤來計算，約需九十二萬萬斤的糧食；照上表雜糧的總數比較，也可以自足，（專食米麥恐嫌不足）

再看山西省的情形，關於每年糧食的產量，約如下表：

玉米	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斤
小米	一一四，〇〇〇，〇〇〇斤
高粱	一七，〇〇〇，〇〇〇斤
大麥一	二四一，〇〇〇，〇〇〇斤
高粱	二四二，〇〇〇，〇〇〇斤
玉米	五九六，〇〇〇，〇〇〇斤
雀麥	二三九，〇〇〇，〇〇〇斤
豌豆	二一，〇〇〇，〇〇〇斤
蕎麥	一八，〇〇〇，〇〇〇斤

小麥

二，九二二，〇〇〇，〇〇〇斤

稻

七三，〇〇〇，〇〇〇斤

黍子

一一八，〇〇〇，〇〇〇斤

以上各項，共計六，三三六，〇〇〇，〇〇〇斤。如果也除去十分之一的種子，可供食用的，有五，七〇二，〇〇〇，〇〇〇斤。以山西全省一千一百三十一萬七千人口，每人每年需四百斤計算，總數約四，五二七，〇〇〇，〇〇〇斤。那末除自用外，還可多一，一七五，〇〇〇，〇〇〇斤。

照以上三例看來，似乎都可以自給自足，還有餘存。但是這種產量，是根據平常收成尙好時候的情形，而且連畜產的食料也包括在內，如果除去一部分作爲畜類的食料，也就恐怕方夠了，若再遇到災荒，就非仰仗於外邊的輸入不可。並且這三省，都是比較土地富饒的地方，其他像西北各省，糧食的缺乏，就更可想而知了。

十幾年來，中國的農產，只是有減無增，以致形成這種大量入超的危象，究竟是什麼原因呢？大概講來，也有好幾點。第一關於政治方面的，自然有很大的影響。連年的戰爭，使農民不能安心種植，減少農業的生產。第二，關於社會方面，因爲政治不安的影響，盜匪充

斥，借貸重利，交通阻塞，金融停滯。社會秩序，完全失却常態。雖然有些地方有多餘的糧食，也沒有方法運輸出來，供給鄰地的不足。像前幾月長江下游各地，很感覺到米荒，價格漲到十七八元，甚至在二十元以上。可是在湖南一面收成極好，米價只有五六元，照理東西相隔千餘里，由長江來往非常便利，爲什麼不能互相調劑呢？就是因爲交通阻塞的關係。此外社會上的風俗，也和農產減少有關係。例如鄉村間的墳墓往往都築在田中。這樣墳墓一年年多起來，也是減少農田影響農產量的。

第三種原因，就是教育的關係，講到中國近年來的農民教育，簡直可以說一無成績。在從前盛行私塾的時候，農村地方還可以公共請一位先生來教讀。一村中的農家子弟，也可以讀幾本百家姓，千字文，認識幾個字。到現在，私塾既加以取締，學校又因爲經濟人才，兩感缺乏，不能普遍設立。情形更是不行，據調查所得，農民教育最發達的地方也只有百分之五。此外稍爲冷僻或山谷的地方，往往有數村之中，竟無一個識字的人。至於現在所已有的農業教育，可以說完全失敗。因爲這些辦農業教育的人沒有按照中國農業實際的情況，制定出一個訓練農業學生的標準。只是模仿普通教育很發達。教育經費很充足的國家的情形把他們的農業教育制度生吞活剝的搬到中國來教授給學生，這裏農業科學和種植的方法，當然很

好，很能夠改良和蕃殖的農產，但是這種方法，需要很大的資本，例如一架播種機器或一架割麥機器，都要化上幾百元或幾千餘元的本錢才能辦到，試問中國的農民，有沒有這種經濟能力呢？而且中國的農業學校，所教授的課程，不是使一班畢業學生，回到鄉村去改良農業，却養成一種農村方面的特殊階級，本來農家子弟的生活，簡單，到了學校以後，飲食起居，都講究起來。甚至厭棄鄉村更談不到改良農產。

所以我們看農業教育的結果，農村方面送一百個子弟到學校，農村就失掉了一百個子弟。他們畢業以後，並不是穿短衣服到田裏去種植，都跑到都市裏來找工作。這樣農村方面積蓄些錢供給子弟去求學，本意是希望他們學成回來做一個好幫手或是繼承者：豈知把子弟送到學校裏去，竟不是農村的子弟反成爲都市的子弟，貴族式的子弟，這樣情況，自然使多少農家灰心使農業教育失却信仰，其實照中國現在的農村環境，並不需要很高深很科學的智識。我們只要使一班農家子弟，得到多少很單簡而很有用的農業常識，能夠知道化很少的資本，或是不化資本，單用他的材料，就可以改良農業增加農產，這樣一定很容易使農家發生信仰，使農家子弟仍可以回到鄉村去工作。但是過去的農業教育，並沒有注意到這一層，以致對於原期的目的，完全失敗，反而影響到農業的衰落。

，在政治，社會，和教育等各方面。都可為促成農業衰落的原因，而農業本身，確缺點，幾千年傳下來的種植方法，只知保守，不求改良。就是一個大缺點，因為只法，於是農民耕植的效能，永不能增加。譬如看下列各地農家的耕植面積表：

省 別

每農戶所耕面積

察哈爾

五十五畝

遼 寧

四十畝

山 西

三十二畝

河 北

二十五畝

江 蘇

十八畝

浙 江

十三畝

每農戶的效能最多也只耕種五十五畝田比較美國每農戶耕種的面積有四百十二畝不知相差多少倍，結果一年間勞動所得，在中國北部每一壯丁只得五十五元，東部和南部，也只有百餘元，再看美國的每一壯丁，每年勞動所得，有二千一百金元，其間相差自然又是好幾十倍，一家的支出，是依收入的多寡為準，而人民生活費的高低，自然也由此而定，所以中

國農村，以六口之家（一夫一婦四小孩）來計算，一年所需的生活費，約有二百二十八元，在美國五口之家，（一夫一婦三小孩）一年消費就有，千五百九十八金元。生活費的數量，相差這樣遠，也毋怪中國農民的生活，日益困苦，農業的生產，日益減少了。

以上種種，都是中國農業衰落的原因，由於這些原因總合起來，結果，國內本來荒廢的土地，固然沒有人去墾殖，就是已經種植很好的土地，也逐漸減少產量，再加以許多農家子弟，受了不良的教育，都集中到都市裏來，更使農產方面日見衰落，但是這些農家子弟，集中到都市裏來的目的，無非是棄農職工商，走到工商業的路上來，不幸中國的工商業，也是不能發達，決不能容納無限量的農家子弟，以致有許多人，固然有了工作，可以生活的，有許多人就免不了失業，這些失業的人，在鄉村間，生活雖然比較困苦總還可勉強過去，現在到了都市裏面，希望斷絕，又不願再回鄉村去耕種，於是不得不挺而走險，爲非作歹的去做法盜匪或做游蕩者了。這班盜匪和游蕩者一天多如一天，無論都市或鄉村，已覺到不安寧，又加以現在許多反動派，共產黨，正想利用機會，引起紛亂，就免不了去勾結煽惑這班失業游民來，助長們的勢力，所以這幾年來，就是向來很安定的地方，也時常鬧得很不安定，推求其故，無非是農業問題和農民生活問題，沒有解決，才釀成現在這種情況。



我們既然知道這種弊病，認清其中的原因，自然應該想救濟的方法，我們覺得對於農業問題，如果政府方面認定他的重要性，採用農業政策，不但全國糧食問題可以解決；同時地方的治安，大多數人民的生活，以及其他各種事業，都可以得到一個總解決，並且還有一個很顯明的表示，就是保持中國國民性的問題，中國一般國民性比較和平，總理孫先生講：『平和是中國人民的美德。』但是再研究中國國民的平和精神，究竟怎樣來的呢？就可以說全是農業國家的關係了。因為處在農民的環境中間生活很簡單，一切事情，都是自供自給，與人無爭，希望自己的生產增加，自己的生活寬裕，完全要靠自己的努力，不得依仗旁人，因為人人知道自己的努力，就是減少和人的競爭；與人無爭，自然就養成平和的精神，所以平和實是農業國家基本的原則。

並且農業和家族制度，有密切的關係。我們看一個農村中間，直接間接，各農戶總有親戚的關係。大家相處一地，自然發生親愛互助的精神。有無相通，患難相恤。我們常常看到農村中間一家人忽然有客人來，不及預備菜肴，就可到鄰近各家去借。這家去借一碟肉，那家去借一瓶酒，隔幾天再去歸還。還有祭祖和節宴等習慣，各人家互相往來歡聚，也是發生親愛互相的精神。這種互助精神就是農村的特點。中國幾千年來有因為農業立國，就養成了

這種和平親愛和互助的國民性。無論國家社會和個人，都不以侵略人家，好大喜功爲是。就在漢唐的全盛時代，政治軍事的力量很大，可以使國界四周的小國或小民族，都把他們統一起來。但這種統一，完全是政治上的策略，決不抱榨取人家的利益和壓迫人家的意思。屬國對於中國，雖然年年要有進貢，但是數量也極微薄；而中國政府也一定用很重的禮物犒賞來使，這樣的處置，完全是懷柔政策，王道精神；而這種政策，這種和平非侵略的精神，也就是農業國家精神的表現。

反觀現在許多工業國家，只是講侵略掠奪和霸道。是不是這些國家的人民天性是如此呢？再如歐洲的國家，從歷史上看來，戰爭最多，是不是這些國家的人民都是喜勇好鬥呢？其實霸道和王道的不同，就是工業國家和農業國家的區別。我們知道工業國家的出發點全是其爲地狹人衆，農產不足，人民生活不能解決，才不得不想生財之道，拿自己的工業製造品，去換人家的農產品，或是掠奪人家的利益，來增加自己的利益。農家國家的精神是尙有餘，工業國家的精神是感不足；不足則生貪污自然要侵略人家的經濟利益。所以這種精神的表顯，在政治方面，成爲帝國主義；在經濟方面，成爲資本主義。而在個人方面，也就成爲個人主義，這種主義，只是有己無人，自然沒有和平博愛的精神，沒有天下爲公忠恕之道和推己

及人的心理，我們看帝國主義者只是想由他一個國家民族，來壓迫別的國家民族，資本主義者，只是想由他一個經濟組織，來壟斷別的經濟組織，決沒有互助的思想。所以工業國家的人民，和農業國家的人民性情不一定相差很遠。可是因爲出發點不同，結果才愈趨愈遠，在農業國家講和平博愛，而工業國家則走到侵略掠奪的路上去，對於國際間，只想壓迫爭鬥，造成現在循環不已的紛亂。

這種紛亂的情形，自然不是理想的世界所應有。所以有許多大學專家，認清弊病所在，就竭力在工業國家內提倡農業來調劑。尤其是地大物博的美國，總是想從農業的發展，來調劑工業國家的精神，工業國家是如此，我們中國當然更應在農業方面努力，才可以保持中國固有的國民性，才可以農民的美德，擴張到愛人，愛國，愛世界，使世界走到和平大同的路上去。

並且從立國方面看來，中國要保持和平的美德勤儉耐勞的精神，固然非主張農業政策不可，就是從人民生活方面看來，也應該從發展農業來解救。否則照近年來食料品輸入這樣多，萬一國際交通阻塞，就可發生餓死幾千萬人民的危險。同時我們知道中國整頓農業，是輕而易舉的事。只要地方秩序能夠安寧農業教育能夠注重，一定可以在短時期內得到很大的成

續，和進步。假如中國第一步可以把農產做到自給自足，就可以解決全國人民的糧食問題，第二步如果有有餘的農產運輸外國，換取人家的金錢和工業品我們也可以做到出入相抵，不致搖動國家經濟的基礎，國家基礎可以穩固，人民生活問題可以解決，地方上無業游民當然可以減少而盜匪也就無從產生。並且大多數人民回到農村去工作，都市的失業問題就容然解決，一切社會的變態病理，也就可以免除，這樣民生問題社會問題可說解決了大部分，於是富而後教，人民能安居樂業，對於政府的信用，自然增加，儘加幫助，政府和人民能打成一片，通力合作這樣的政府，才是民衆的政府，才是爲民衆謀利益的政府。所以人民生活不要顧慮，一切政治和社會的建設，都可以辦起來，而一切科學和工業在一轉移間，也一定可以很快的進步發展。同時再普遍教育一方面使農民知道農業常識，改良農產，增加生產量。同時再灌輸國民常識，使農民成爲良善的人民，知道國民的權利義務，可使政治成爲民衆化，這樣的辦去，才可說是有步驟的解決方法，才可以希望中國的經濟建設成功。否則人民生活問題沒有解決，政治無論辦得怎樣完備，就好像在沙灘上建築一座很堅固的洋房，洋房雖然用鋼骨水泥來建造，因爲基礎是不結實的散沙，不久就會陷下去，落得一場空。所以我們能夠認清中國經濟建設的基本，在求農業的發展和進步，那末在此軍事告一段落以後，

政府能夠努力於清鄉剿匪，社會交通能夠恢復，金融能夠流動，秩序能夠安定，人民能夠可安居，農業問題既可着手去求解決，其他一切問題，自然可以連帶解決，而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的建設也可以積極的成完了。

## 服務的**精神**與服務的**道德**

邵元沖

十九年十一月三日在考試院 總理念紀週講演

各位同志：上一月中央於軍事告一段落以後，就決定在本月十二日召集四中全会。召集四中全会的重要任務，一方面是討論軍事的善後問題，怎麼樣使軍事能夠結束和整理；使地方的清鄉，剿匪，恢復交通等工作，能夠積極進行，得到澈底的完成。同時還有一部分基本的工作，就是在軍事結束以後，對於黨務和政治兩方面的工作，應該怎麼樣去求發展和推進。

要推進黨務和政治這兩方面的工作，就是要怎麼樣能夠使黨的工作和政治上的工作能夠積極表現效能。要使黨務和政治的效能積極表現，基本的原則，就早要使一班爲黨政服務的同志，大家能夠把服務的精神，奮發起來，使他們都認識服務的意義，和服務的責任。

我們看過去幾年中間，在中央黨部監督之下的黨務，在國民政府統治之下的政治，有許多地方爲人民所指摘，批評，和懷疑。但是這些指摘，批評，和懷疑，並不是對於黨的原則，或 總理的遺教，有什麼指摘，批評，和懷疑，還是在事實方面，或人的行爲方面，使一般人要有指摘，批評，和懷疑的地方。所以 總理的遺教， 總理所定黨務和政治的方案，可知已爲全國人民所信仰。全國人民都願意這種方案能夠趕快實現。可是人民的希望這樣急切，而黨政方面却不能盡量發揮工作的效能，表現出服務的精神，才不能不使人民發生許多指摘，批評，和懷疑了。

我們要使黨政工作的效能積極表現，就要使黨政服務的同志，振作他們的服務精神。從前 總理已經講過，黨員對於黨，或是黨對於國家和國民，完全是服務的性質，並不是爲了有何種利益的意思，或有所利而爲之。大家所以有這種服務的志願，完全因爲對於主義的信仰，並且認識國家和民族的情況，才來擔負一部分的責任，作一部分的工作，使整個國家和民族，有振興的希望。因爲有了這種勇氣，才來參加黨的工作，從黨的工作，來參加政治的工作。其間完全是自動的行爲，一些沒有勉強的意義。然而黨員既然入了黨，就要受黨的制裁，無論何時何地，除非自動的脫離黨部都要恪守黨的紀律。所以黨員對於黨的進退雖很自

出，然而身為黨員的人，就不能不恪守黨的紀律，充分表現出爲黨服務的精神。同時全國人民都能認識服務精神的重要，大家共同努力做去，才可求得整個國家的改造，整個民族的進步。

但是服務的精神，究竟怎樣能夠表現呢？我們要知道服務精神的表現，全仗服務的道德。一定先要認識服務的道德，尊重服務的道德，然後服務的精神，才隨之而表現出來。我們看專制國家和民主國家精神上不同的地方：君主國家只是拿帝王的無上威權，用他的法律來制裁人民。而民主國家就可用社會的輿論，個人的道德，相互制裁，相互督促。所以民主國家，本來應做到政簡刑清的地步，使法律只成爲一種約束的工具，並不像在專制時代嚴刑重法，用威嚇的手段來禁止人民的行動。在民主國家內，應該本各人自己的道德心，和社會上的輿論，互的制裁。一切爲非作亂，都認爲不合於做人的本分。大家有了這種道德的精神，彼此約束。從事業上來努力，才能把服務的精神推進，才能把服務的精神，積極表現於事業之中。

從前 總理講：『青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但是那一種事，叫做大事呢？我們以爲無論那一件事，只要從頭至尾去努力，澈底去做成功，便是大事。譬如柏斯多的研

究微生物，在普通人看起來，必以爲算不得一回甚麼事，何必枉費工夫去研究他呢？不知由研究這種微生物，便發明微生物對於人類和各種植物的妨害極大，便想出許多撲滅微生物的方法。到現在，全世界由於知道消滅微生物以後所得的利益，又是何等大呢！所以微生物本是極微渺極小的東西，但是研究他關係於動植物的利害，有一種具體結果，貢獻到人類，便是一件很大的事了。

所以事業的大小，決不能以地位來做標準的。應該拿有成績表現出來能夠貢獻到人類的事業做標準，才是真正的大事業。我們看歷史上地位最高的帝王將相很多，可是傳下來能使人民記得的，能有多少？而許多發明家以及在政治上，或社會上事業真有成績的人，反能夠永久流名於後世。爲人所欽仰，就從小處來說：譬如一二學者著作了幾篇很有價值的文字或是從前各地方的知府，知縣，在一地方有多少善政，這一地方的人民就永遠知道這些人，雖然經歷數百千年，也不會遺忘。但是當時的帝王將相，就沒有多少人能知道了。再從大處來說：譬如電氣的發明，在發明的時候，實在也不足爲奇，豈知由於那時候的一些萌芽，擴充改良以後，竟得到很大的效果。到現在電氣的應用，普遍於全世界，而將來的發展，更是不可限量。可知這種功績，才是有益於全人類，決非在政治上或社會上占有地位的人所能比擬



。所以大家能注意到這一點，拿創立事業作爲標準，才能認識自己服務的責任，同時還能增加服務的興趣。知道本身服務有成績現在出來，他的地位和名譽，比了社會上徒負虛名地位很高的人，更是受人尊重，更能傳之永久。

然而服務精神方面自動表現以後，究竟怎樣使服務效能能夠充分表現呢？這一點，就和支配工作方面很有關係。總理時常講到『人盡其才。』所謂『人盡其才』，一方面是使各個人把自己所有的智識能力，要儘量發揮和利用，供獻到事業上；同時在社會上或政治上負責支配工作責任的人，也一定要有很好的方法和標準，去支配各個人的工作。一定要按照各個人的智識能力，去給他適當的工作，才真能達到『人盡其才』的目的。所以這種『人盡其才』的研究和應用，或是盡自己的才；或是使人盡其才。在近代科學上，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因爲要盡自己的才一定先要認識自己的才。如果不能把自己的智識能力，認識清楚；所學非所用，一定不能得到好的結果。譬如本來研究學問的人，忽然想在政治上活動，本來學軍事的人，忽然喜歡做政治工作；本來研究政治的人，忽然從事於軍隊的工作。這種所學非所用，用非所學，不但誤了自己的前途，在社會上也受了很大的損失。因爲研究學問的人，他能專心致志去研究學問，最後自然會有相當的成績表現出來，或者可以有利於人民的智識。現在

丟了研究學問而不顧，却去從事政治工作，或著了多少政論，以迎好一般人的心理，圖自己的活動，這樣心勞日拙，那裏會得到好的結果！

同時對於支配人的工作方面，就是在盡他人之才方面的人，如果能夠認識各個人的長短，用其所長，除其所短，那末社會上除了下愚不移的人以外，人人也都可以表現出相當的成績，供獻給社會。不過支配人的工作，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一定要對於各個人的能力性格，加以審慎的觀察，才可以避免錯誤。如近代心理學的進步，對於人的心理觀察，大有幫助的地方，其次就是近代工業方面的分工，和科學管理的方法，更是良好的幫助。

我們知道，近代工業，日趨繁複，一種工作的完成，往往經過幾百種，或幾千種的手續。這許多手續，如果只有少數幾十人去做，那末他們的工作不但不容易精，就是要去學會，也須費了很長久的時間。我們看中國許多工匠，他們的確可以運用許多工具。但是一個銅匠能夠學會做一種銅器，就要經過三四年長時期的訓練而學會以後去製造東西，還是又慢又粗不能精細。所以在現在科學進步以後，工業製造，就用分工的方法，求工作效能的增進。每一種工作，應該有幾十種手續，就由幾十人去工作；應該有幾百種手續，就由幾百人去工作。一個人只做極小一部分的工作，他的工作，自然輕而易舉，易熟易精。無論智識怎樣淺陋

的人，也可以在幾天之內學會去做一種工作。所以我們去參觀製造汽車的工廠，凡是冶鐵，鍊鋼，製輪，造軸，以及一切裝置，油漆，等工作，都分成很細密的部分，由數千或數萬工人分任，如果先從冶鐵一部份參觀，經過鍊鋼，製輪，等數百部分，到末了一部分，就能看見一輛一輛的汽車，已經製造完竣，可以開動出去了。這種工作何等神速，但是做這種工作的工人，卻不是都有很高深的學問和技能呢。考其實，有許多工人連字都不識咧！所以這種工作的表現，完全因為分工的關係，把工作分得細密，可以很單純的由粗笨的工人去做，構造很複雜的汽車出來。

當然，工人的工作是很單純了，而其間需要聯絡的地方就須由工頭和管理人員去擔負支配工作的責任。所以和分工發生連帶關係的，就是科學管理的方法。所謂科學管理法，一方面使工作能夠分配適宜；同時使工人的效能，也可積極表現。工人的效能，怎樣能積極表現呢？是不是使工人一天到晚的工作就可以增加工作效能？這種舉動，當然不可能的。我們所謂科學管理方法，表現工人的工作效能，是要使工人的工作精神，常保持原狀，不致過於疲勞。我們看許多關於科學管理的書籍上，專門家對於節省疲勞，都用很精密的方法去研究。例如研究疲勞程度的增高率，就用一種測驗的方法，使許多工人在不同的時候去測驗。如果

一個工人在進廠的時候，可以舉起一百斤重的鐵錘，到工作兩小時以後，究竟要減少多少力量，到四小時以後，又要減少多少力量。這樣的測驗，就可以用統計的方法，得到工作疲勞增高率由於這種工作疲勞的增高，又可推定兩種結果：一種是工作不能敏捷；一種是工廠危險的增加。因為工廠的組織細密，機器的運用複雜，如果工廠的安全設備不善，工人在精神疲倦的時候，就很容易發生被機器軋死的慘劇。我們在報紙上，往往看見上海的工廠有女工因辮髮被機器絆住牽入機器的事。這種是，大概總因精神疲勞，一時疏忽所致。所以科學管理的意義，就是使各個人保持原有的工作精神和能力，積極發揮各個人的工作效能。

綜上所言，一方面使各個人認識服務精神，選擇本身的工作，然後才有興趣和希望；同時在支配工作方面，就要各盡所長，以來工作效能的發揮。中國對於支配政治方面的工作從前也很注意。如大戴禮裏面有一篇文王官人，就是講用人的方法，觀察各人的性情，能力，分別給予一種適當的政治工作。還有劉邵著的人物志，對於人的性情和能力的區別，以及心理和事業的關係等，也都有很詳細的解釋。

當然「八盡其才」的作用，就是要發揮一班人的服務精神，充分表現於事業上。至於服務的道德就和心理建設有相當的關係。我們做一種工作，固然希望他成功，但同時也要使他直

接間接有助於社會的進步，和國家的發展。如果一種工作的成功，不能直接間接有助於社會的進步和國家的發展，那末就表現我們的事業不能真正有益於社會國家。並且現在我們如果沒有光底更新的精神，從事業上表現成績，還是不能改變從前國際間對我們的眼光。國際間的眼澈不改變，中國的國際地位自然不能提高。中國的國際信用自然不能增加。處在現在國際關係密切的時候，如果一個國家，不能得到國際間的信用，那末任何種活動，都很困難進行，都要橫受阻礙。所以我們要使中國在國際方面得到很高的地位，我們就要使中國整個事業方面，有成績表現。由各個人對於服務精神的認識和鼓勵，大家表現於各個事業上。各個人的事業，合起來就是中國國民的總成績，如此，中國國家才可望發展，而中國社會才可望推動前進了。因為現在的社會，如一架已鏽的機器，無論有很好的方法，或是中央，或是地方，願意振作做事，地是因為機器不能推動，就不能表現服務的精神。如果要推動這架機器，自然要使一般人都以本身服務道德做標準，很公道很坦白和很純正的從事業方面努力，才能得到很好的結果。

中國在專制時代和春秋戰國六朝等羣雄割據時代，在心理上養成許多很不好的習慣。例如那時候的縱橫家陰謀家等，他們都不想從自己事業上，表現他們的才能；却完全用陰謀，

策略，去煽惑當時各地的領袖，成爲羣雄割據的局面。這些領袖，又因爲要求本國的富強，本族的發展，於是對於人民的道德，社會的風化，都可以置之不顧。例如三國時曹操要求賢才，竟爲目的而不擇手段，說甚麼『凡不仁不義盜嫂受金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吾皆得而用之』等語，來獎勵一班有才無行的人，風氣所趨，就釀成後來五胡十六國幾百年的混亂。

此外在君主專制時代，雖然也有提倡文化尊重道德的時候，但是所用的人，却完全要屈服於君主之下，供他個人之指揮，做他個人的奴隸。而許多臣子也就卑躬屈節，奴顏婢膝，去求帝王的歡心。甚至宰相求好於太監，來保全他的權威。這些都是專制時代不顧道德的弊病。同時還因爲在專制時代要求榮華富貴，只在帝王一人的手上，於是就不得不想方法，攻訐別人，破壞別人的計劃，養成一種挑撥妒忌的心理。這種弊病，數千年積下來，到現在還未革除，所以軍閥稱兵作亂，在軍閥自己，或可說是糊塗妄爲，而一般政客官僚的挑撥離間，就不能不說和從前專制時代的不良心理沒有關係了。

我們現在要打破這種專制時代不良的心理。大家知道在平民政治的國家裏面，各個人只要有事業上的成績表現於社會，都可以得到相當的地位和名譽，決不能鉤心鬥角去想別種不利人的方法。可以求得的。因爲平民政治的精神，注重於國民的道德。國民道德的表現，一

方面是注重於人品的修養；一方面就應注重於服務的道德。一定要全國大多數人民都注重人品修養和服務的道德，才可以把整個國家和整個社會推動起來，泯除從前種種不良的心理。所以要求黨務和政治方面的進步和發展，就要積極發揮服務的精神和服務的道德；而現在軍事告一結束的時候，尤其是要在黨務和政治方面積極表現成績，才可以建立國家鞏固不拔的基礎，才可以求得國家長治久安的局面。

## 戰後急應改正之心理

邵力子

十九年十一月三日在中央紀念週講演

兄弟與中央諸位同志，有半年多沒有見面了。今天乘這個機會相聚一堂，談一談話，很覺歡喜——近一週間，討逆戡亂的事，看來更可圓滿結束，和平建設，更有把握，陝西討逆，是由楊虎城同志担负完全責任，據報上月二十五日克復潼關，西安距潼關三百餘里，城池比較堅固，在我們想還須經過相當時間，可到西安。但是到了二十七日下午，楊虎城同志的部隊已經入了西安城。進行之速，殊為始料所不及。記得民國十五年，楊同志固守西安八月而未失陷，此次竟由潼關二日而到西安。且不血刃而克同一西安，楊同志的兵力，不一定勝於劉郁

芬宋哲元的，可見此次並非兵力關係，純爲主義關係，蓋以楊同志昔年卽奉 總理之命令，在西北爲革命中堅，使吾人不能不感到主義力量之偉大。我們在此戰勝之後，更應格外戒謹勤慎，因爲每有除利之後，常常伏下以後失敗的原因，戰爭固爲不祥之事，惟據史學家言，戰爭亦爲促進文明之事，按諸中國歷史，戰爭向未促文進明，祇有摧殘文明，卽戰事本身數千年來，亦鮮有因戰事結果而得進步者，我們的槍砲直到現在，仍是跟着外人學，利器仍從外人手中買來，打了多少次仗，始終並沒有進步，凡在戰事中間沒有不經過困難危險的，自應藉得教訓，而有進步，而過去事實，竟不如斯，因爲戰事一經過去，卽把困苦艱難一齊忘掉了，人人都講辛苦久了，應該休息一下，舒服一下，更有邀功圖報者，像這種樣子，雖有確定勝利，亦無進步心理，中西歷史，比較起來，中會歷史向來是一治一亂的循環式，西洋歷史則不論和平戰爭，皆餘螺旋式之進步，我們乃是一個走馬燈式，走來走去，不出燈的範圍，這是很可怕的現象。此次戰事期內，兄弟不明軍事，僅依蔣同志之囑咐命令，作一點扶助的工作，並沒特別貢獻的意見，不過此次經過的困難很多，中央軍的經濟優勢，超過敵人，尙且延至五月之久，傷兵士十萬以上，前方將士，及後方同志，皆應知道這一次的勝利，是很不容易，雖然有蔣同志的好戰略，而把握還是靠在主義，戰後我們應有覺悟，軍事方面應該



力求進步，武器不應專靠外人，將來世界大戰，我們或者捲入漩渦，即如汽油一項，我們自己不能夠造，一旦外人斷絕來源，我們的汽車飛機，便不能夠行動，這樣豈不危險萬分嗎！

此次兄弟歸來聽了人家問我的話，發生很多感想。身在前方聽到後方，造有某某死某某受傷的謠，倒不覺得討厭，回來以後聽見人家說：「某一部分要有變動了，你要作什麼了，某處應該換一換了。」比在前方聽到人家說我死了還難過，要知這種謠言，全由走馬燈式心開而來，有如戲台上邊白臉的進去，紅臉的出來，轉來轉去，我們覺得是最為討厭。其次又有人說「我們現在可以休息一下了，可以幾年不打仗了。」爲什麼不希望永遠不打仗呢？可見對於以後的觀察，還是沒有把握，以爲閻馮或能再起，或須再有繼閻馮而起者，一般心理，仍以走馬燈式來觀察，這種社會心理，乃是過去歷史所造成，現在要靠我們一般同志來改正以前的歷史，及一般人的心理，這種心理，如不加以改正，不但討逆戰事，不能得到真正的結果，就是前方死亡將士，亦算白白死了，這次戰爭缺陷很大，危險很多，軍事人員，應知缺點，力求改正，我們大家亦應想法來共同糾正，即如對傷兵一事，我在前方見到傷兵來了，都不敢看，避入房內，因爲傷兵的苦痛太甚，使得我不能支持的忍心看下去，這是一般社會和我們同志應負的責任，各國對於救治看護傷兵，都是全體社會來作，予以物質及精神上之

安慰。蔣同志很知道這件事的重要，所以叫勵志社組織了一個傷兵視察團，但是人數既少，不濟於事。日本對俄對華兩次戰爭，均有婦女團體，分往前後方担任救護和安慰傷兵，并予以精神上之鼓勵，所以傷兵好了，立刻很踴躍的還回到前方去服務，何以我們此次戰事，社會人士及後方同志，獨無這種組織呢？此乃吾人很大的缺點，亦是人類職務上的一大缺點，此全由於平日沒有準備，以後是必須改正的，至今後全盤行政應有之覺悟更大，應該把走馬燈式的心理改過，一步一步的向前進，青年常常煩悶，每謂工作沒有興趣，不能發展其才能，其實現在作工應當自己去找興趣，不要去比地位高的人，應該去比地位低的人，能夠明白這一點，對於目前的地位，就不能感覺不安了。即以石友三而論，這一個人是人人皆知，人人稱奇，按他過去的歷史，惟一缺點，即常常對其個人地位感到不滿足，即使作了皇帝，他還想要作神仙，如此本身常覺煩悶，以後事事皆無進步了，此種心理，必須改掉，世界公理，不能進前，就要後退，中國立足於現在的世界，還能容我們這種走馬燈式的社會嗎？如果這樣，將來一定會被人踢開，今當討逆勝利，利平建設的歡喜時候，我們更應戒慎恐懼，改正以前的毛病，於整個的黨國工作上，力求進步。

(完)



